



特刊



环球国际 (2009秋季) 论坛

主办：环球杂志社

GLOBE FORUM (Autumn 2009) SPECIAL

上海世博会： 新生活、新环境、新能源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New Life, New Environment, New Energy

上海世博会：中国发展新里程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A New Milestone of China's Development

从世博会看人类社会发展新动力

World Expo and New Motive Force of Human Society

友谊让城市更加美好

Friendships Make Cities More Beautiful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课题——应对经济危机之日本经验

State of Global Economy, its Challenges, and Japan's experiences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与东亚

Global Economy and East-Asia after Financial Crisis

“世博周期”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Cycle of Expo and Tendency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目录

CONTENTS



02 在“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的致辞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周锡生

KEYNOTE SPEECH 主论坛演讲

10 上海世博会：中国发展新里程

——上海世博局代表、世博会国内参展顾问 黄耀诚

12 从世博会看人类社会发展新动力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前驻法国大使 吴建民

14 友谊让城市更加美好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 陈昊苏

16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课题——应对经济危机之日本经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代表、理事 小手川大助

18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与东亚

——日本财务省顾问、前财务省事务次官 杉本和行

20 “世博周期”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郑新立

SUB-FORUM DISSCUSSION 分论坛讨论

22 新生活：寻找城市发展的平衡点

28 新环境：未来城市的“绿色竞争力”

36 新能源：未来发展“战略高地”之争

FEEDBACK 媒体反馈

环球杂志社 Globe Magazine

新华通讯社主管

瞭望周刊社主办

Supported by Outlook Weekly, Xinhua News Agency

总编辑 Editor-in-Chief：姬斌 Ji Bin

执行总编辑 Executive Editor-in-Chief：胡俊凯 Hu Junkai

副总编辑兼总经理 Vice Editor-in-Chief & General Manager：

王磊 Antal Wang

副总编辑 Vice Editor-in-Chief：聂晓阳 Nie Xiaoyang

李晓明 Li Xiaoming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特刊 GLOBE FORUM (Autumn 2009)

时间：2009年10月17日

地点：北京·昆仑饭店

主办单位：环球杂志社

主编 Chief Editor：李晓明 Li Xiaoming

副主编 Vice Chief Editor：陈颖 Chen Ying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于多 Amy Yu

编辑 Editor：姚丽萍 Yao Liping 陈茜 Kathy Chen

美术设计 Art Designer：闫迪 Yan Di

摄影 Photographer：张军 Zhang Jun 王轶欧 Wang Yiou

于多 Amy Yu

编辑助理 Assistant Editor：娜迪娅 Nadiya

发行经理 Distribution Manager：李利建 Li Lijian

联系方式 Contact

事业拓展部 Business Development: 010-63077015/16

传真 Fax：010-63073516

地址 Address：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新华社第二工作区

邮编 Postcode：100040

电子信箱 Mailbox：huanqiuluntan@vip.sina.com

主页Homepage：http://globe.xinhuanet.com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Shengtong Color Printing Co.Ltd



特邀主持人 闫丘露薇

凤凰卫视记者、知名主持人、战地记者，《环球》杂志专栏作者。2001年11月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她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进入战地采访的中国记者第一人。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右）与日本财务省顾问、前财务事务次官杉本和行（左）握手致意。中为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胡俊凯

2009年10月17日，由新华社《环球》杂志主办、上海世博局和国家发改委智力引进办公室支持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在论坛开幕前会见了与会中外嘉宾代表。

何平总编辑代表新华社李从军社长对与会中外嘉宾表示欢迎。他说，现在距离上海世博会还有不到200天的时间，新华社正在为上海世博会进行积极的报道。作为新华社主办的众多刊物之一，《环球》杂志举办这样一次论坛，也是新华社上海世博会报道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论坛把主题定为“上海世博会：新生活、新环境、新能源”，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中外交流平台，以

世博会为契机，共同探索实现城市科学、和谐、绿色发展的途径。

何平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全力推动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对中国而言，尽管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总的看，城市化水平依然不高，只有45%多，还不及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如何使70%的农村人口及早地充分地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成果，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相信通过本次论坛，中外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经验交流，获得更多启示和真知。

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副总编辑俱孟军，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姬斌等参加了会见。



周锡生副社长在主论坛上致辞

在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上的致辞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周锡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由新华社环球杂志社主办的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今天上午开幕。我谨代表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先生、总编辑何平先生，

向各位领导、中外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环球杂志社从今年开始，每个季度选择一个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举办一次国际论坛。再

过不到 200 天，上海世博会就要隆重开幕了。所以，本次环球国际论坛选择的话题是——上海世博会：新生活、新环境、新能源。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去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的这一崇高理念，聚集了全球的目光，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深远的影响。如今，国际社会再一次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明年将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因为，这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关系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每一个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同在一个世界屋檐下的同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共同的关注和探讨。

历届世博会所倡导的生活理念以及所展现的文明与发现，都曾经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在我们遇到地球环境日益受损、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自然资源开发出现过度等问题的今天，特别是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地球村”的人很好的思考、研究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似乎呼应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话语。这位古希腊最博学的哲人曾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人类两个最古老的梦想——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想，一个是有关生活的美好愿望。城市不仅拥有并消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部分的资源与机会，同时也承载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重任。很多时候，一座深具各方实力的知名城市，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引擎，是那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支点，也往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名片。在城市作为一张名片存在的过程中，如果它的有些问题处理的不太好，比如交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管理的问题，那么这张名片可能不仅没有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增光添彩，反而还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是抱怨的地方，或者说成为一张人们不爱看到的名片。

城市化是不可逆的，这是各国所认知的规律。但如何使城市的发展更加科学、更加合理、让更多的人感到更加美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问题。我们在谈论城市化的时候，也许谁也不会否认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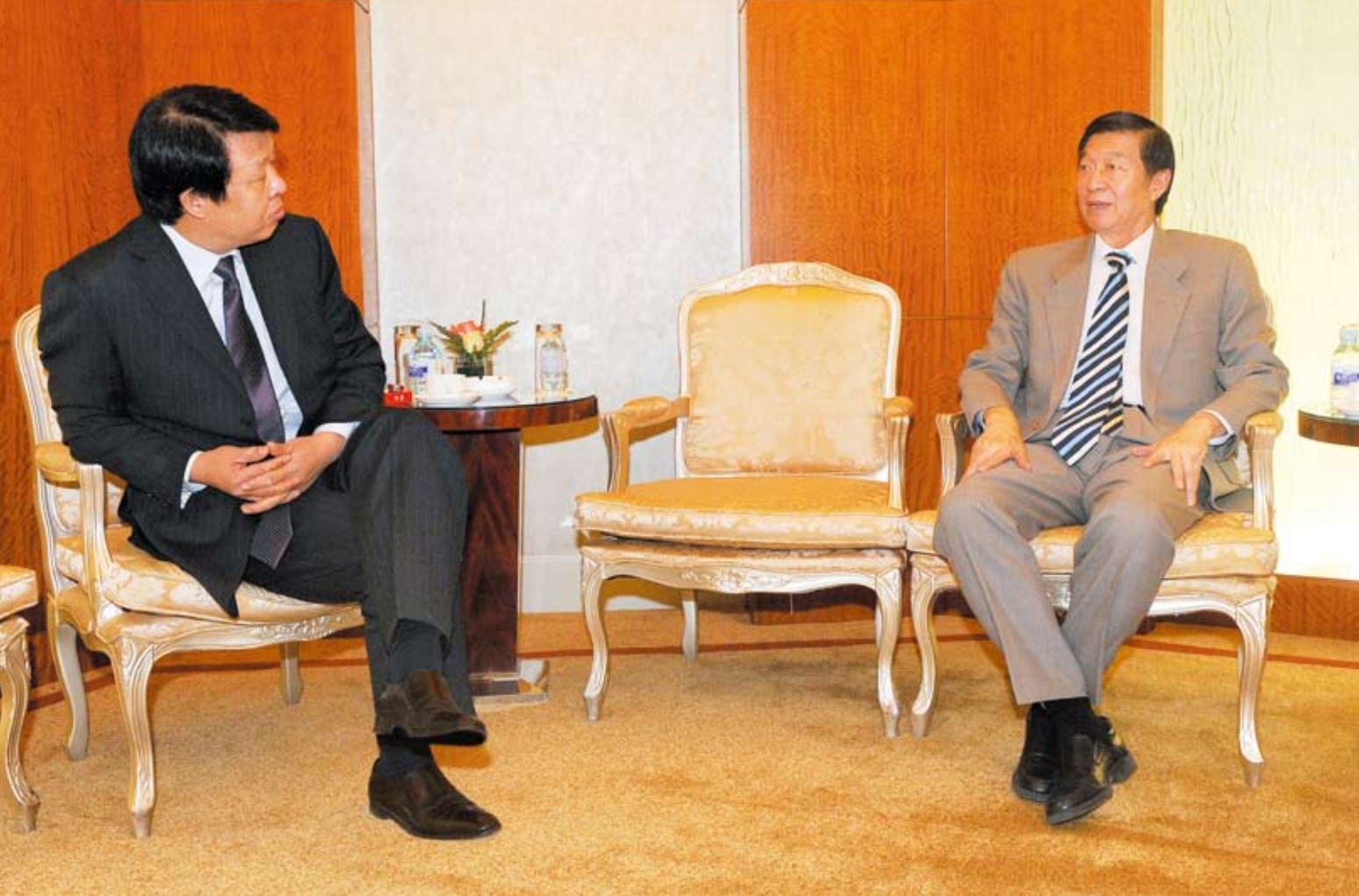
的现象：当你到大街上问一下路人，你是愿意生活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想大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快的回答：“我愿意生活在城市里”。当然如果你问一些在城市里住惯的人，他可能会回答更愿意住在乡村里。但是那些向往城市的人一旦住到城市里之后，不如意的事情往往就会接踵而至。首先，他们还没进城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从外地到北京本身就有交通问题，从北京的远郊区进入市中心，遇到的交通问题就更大。所以说，一路上大家本来是很高兴的，但往往进入一些城市以后就感觉见非所愿，这时抱怨之声可能会出现。因此我们如何更好地来解决城市的问题，也就是来破解上海世博会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周锡生与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右一）在论坛晚宴上亲切握手



周锡生在新华网直播现场。旁为瞭望周刊社兼环球杂志社总编辑姬斌



瞭望周刊社兼环球杂志社总编辑姬斌与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右）交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城市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可以这样说，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城市梦”的践行过程之中。目前，中国已有了 665 个城市，与 1949 年新中国建立时的 132 个相比，60 年间平均每年新增约 9 个城市；城市化率也由 1949 年的 7.6%，提高到现在的 45.68%；2008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面积（包括市辖区）469.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达 48.9%；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大概是 186279.5 亿元，占全国 GDP 的比重 62%。

这些数据显示出城市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处地位的日益提高。当今中国的城市，迸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也都世所罕见。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还有比较漫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的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会忘记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不会单单是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市，而是要让更多的人在城市生活的更好，享有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中国的城市化既不该是导致各类城

市问题恶化的简单的规模扩张，也不应走占用更多耕地和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的粗放发展之道。中国要走一条促进科学发展与构筑和谐社会并举的城市发展之路，这才是一条永葆城市魅力生生不息之路。

世界的城市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共同的，而发展的模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面对共同问题，我想借用 10 月 9 日至 10 日新华社与 8 家世界著名媒体机构共同发起世界媒体峰会上一句话——“合作、应对、共赢、发展”。在世界媒体峰会之后不久，环球杂志社再次举办环球国际论坛，为我们同外国的嘉宾、朋友，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动沟通、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今天的论坛规格很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很多，既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还有很多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我相信，大家坐在一起，一定能很好地研究探讨城市化问题，对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地区和城市，肯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也必将有利于创建更环保、更节能、更宜居、更美好的城市。

预祝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再次感谢大家！

Globe Forum

环球国际论坛简介

“环球国际论坛”是环球杂志社受其主办单位新华通讯社的委托，定期举办的一个高端国际政经中外交流论坛。自 2009 年起，环球杂志社将于每个季度的末月，选择一个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邀请国内外相关高端人士共聚一堂进行交流和讨论，并通过多媒体平台向海内外进行广泛传播。

《环球》杂志自 1980 年创刊以来，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新闻期刊。借助于新华社近 200 个驻外分社和国内各省市的采编机构，《环球》杂志秉承客观、公正、冷静的报道理念，以中国眼光观察世界，以全球视角报道中国，在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直向国内外传播着权威声音。

2009 年 3 月 28 日、7 月 1 日，环球国际论坛先后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春季和夏季论坛，上百家国内外媒体对论坛进行了详细报道。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领导与学者以及来自世界银行、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十余个驻华使馆的大使和使馆官员以及众多跨国公司、投资机构和著名本土企业的高管代表等参加了论坛。

环球国际论坛将在新华社的支持下，致力于打造国内最高端的权威政治经济中外交流平台，也愿意与国内外的各界领袖精英、权威机构探讨各种合作机会。

Introduction of Globe Forum

The Globe Forum hosted by the Globe Magazine with th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Xinhua News Agency is a quarterly held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for Chinese and overseas elites. The Globe Magazine initiated the event in 2009, inviting renowned speakers and guests to attend the forum and discuss selected topics about maj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issues with high attention at the end of each quarter. Currently, the forum is widely know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its 30-year history, the Globe Magazine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newsmagazin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a broad network composed by reporters and editors in nearly 200 overseas branches and provincial branches in China, the Globe Magazine insists in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fairness and imperturbability”, reporting the outside world with its unique angle and tell the world what a real China is.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authoritative soun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The Globe Forum (Spring 2009) on March 28th and its

summer-season round forum on July 1st were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Hundred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ed the event in detail. The forum was lightened by attendance of many celebrities, including top official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State 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and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enior economists from the World Bank, Harvard University and etc.; More than 10 ambassadors and diplomats from foreign embassies in china; representatives of chief executiv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organizations and prominent local companies.

The Globe Forum under support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is committed to build an authority of high-leve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xchange platform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also willing to work with leaders and elites in every industry and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various kinds of cooperation.



周锡生

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
市联合会会长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
事会副理事长、原中共中
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吴建民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
前驻法国大使



唐闻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杉本和行

日本财务省顾问
前财务省财务事务次官



小手川大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本代表、理事



榑正刚

日本国土交通省顾问、
前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
审议官



高秋福

新华社原副社长、世界
问题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姬斌

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兼
环球杂志总编辑



杨伟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秘书长



秦大河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



胡存智

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



俱孟军

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



黄耀诚

上海世博局代表、世博会
国内参展顾问



杜平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智
力引进办公室主任(新能
源分论坛主持人)



周牧之

东京大学教授
(新生活分论坛主持人)



吕斌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
(新环境分论坛主持人)



阚丘露薇

《环球》杂志专栏作者、凤
凰卫视记者(特邀主持人)



梅永红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

GLOBE FORUM (Autumn 2009)



韩文科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所长



陈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
中心主任



邵益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资
源研究中心主任



朱中一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
秘书长



吴文化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综
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



贾峰

环境保护部宣教司副司长



李盛

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



岩田隆次

日本Rockfield International Inc.
社长



秋谷静惠

日本日清奥利友集团株
式会社会长



堀内泰司

日本株式会社协和董事
长兼社长



中村秀一

日本社会保险诊疗报酬
支付基金理事长 前厚生
劳动省社会・援护局长



饭原一树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都市
再生机构理事 前防卫省
经理装备局长



Maria Llinares

西班牙驻华使馆(新闻参赞)



Mohamed Hedi Soltani

突尼斯驻华使馆(参赞)



Metin Kilic

土耳其驻华使馆(参赞)



Ponomarenko Dmytro

乌克兰驻华使馆
(商务参赞)



Muhammad Iftikhar Raja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
(文化参赞)



田村由人

日本日清奥利友中国董
事长



斋藤圭介

日本资源能源厅节能・新
能源部部长



胡俊凯

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GLOBE FORUM (Autumn 2009)

与会中外嘉宾



董秀成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副院长



李波

自然之友总干事



朱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高级副
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李一群

电通上海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樊友民

北京中广天籁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监事、高级顾问



浅野寿夫

日本住友信托银行亚洲部
部长



古田善也

日本迪必杰事业投资株
式会社上海代表处所长



Magabito I. Murobi

坦桑尼亚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



Matilda Masuka

坦桑尼亚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



M'Batna Krazidi

乍得驻华使馆
(新闻专员)



Quach Quang Hong

越南驻华大使馆
(一等秘书)



Sofiane Djenidi

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



Babakhan Aslami

阿富汗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



David Wiid

南非驻华大使馆
(一等秘书)



Emile Rwagasana

卢旺达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



Eleni Moutsaki

希腊驻华使馆随员



Muaz Mohamad Al-Otoom

约旦驻华使馆随员



唐鑫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叶齐茂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陈晓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院长



方汉伟

山西金海洋能源集团公
司董事



陈自力

中和住信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环境节能部
门总经理



王磊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聂晓阳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李晓明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
合会会长
周锡生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吴建民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前驻法国大使
高秋福 新华社原副社长、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唐闻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秦大河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
杨伟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胡存智 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
俱孟军 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
黄耀诚 上海世博局代表、世博会国内参展顾问
杜平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智力引进办公室主任
姬斌 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兼环球杂志总编辑
韩文科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
吴文化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
梅永红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贾峰 环境保护部宣教司副司长
陈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
邵益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朱中一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冯艾玲 光大银行董事
李崑 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
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吕斌 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
王振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杨伯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所长
董秀成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陈晓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李波 自然之友总干事
朱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高级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闫丘露薇 《环球》杂志专栏作者、凤凰卫视记者
杉本和行 日本财务省顾问、前财务省财务事务次官
小手川大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代表、理事
榊正刚 日本国土交通省顾问、前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审议官
中村秀一 日本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理事长、前厚生劳
动省社会·援护局长
饭原一树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理事、前防卫省经
理装备局长
斋藤圭介 日本资源能源厅节能·新能源部部长

岩田隆次 日本Rockfield International Inc.社长
秋谷净惠 日本日清奥利友集团株式会社会长
堀内泰司 日本株式会社协和董事长兼社长
Babakhan Aslami 阿富汗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Sofiane Djenidi 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Ahmed Nekrouf 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Theofanis Frangis 希腊驻华使馆随员
Eleni Moutsaki 约旦驻华使馆随员
Muaz Mohamad Al-Otoom 希腊驻华使馆随员
M'Batna Krazidi 乍得驻华使馆新闻专员
Muhammad Iftikhar Raja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Mircea Chitic 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二等秘书
Emile Rwagasana 卢旺达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David Wiid 南非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Maria Llinares 西班牙驻华使馆新闻参赞
Magabito I. Murobi 坦桑尼亚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Matilda Masuka 坦桑尼亚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Mohamed Hedi Soltani 突尼斯驻华使馆参赞
Metin Kilic 土耳其驻华使馆参赞
Ponomarenko Dmytro 乌克兰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Quach Quang Hong 越南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田村由人 日本日清奥利友中国董事长
福永哲明 日本经济产业省亚太地域协力推进室室长
浅野寿夫 日本住友信托银行亚洲部部长
高崎纯 住友信托银行本店支配人兼中和住信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
古田善也 日本迪必杰事业投资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所长
陈自力 中和住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环境节能部门
总经理
周宁 碧桂园总裁助理
樊友民 北京中广天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监事、高级顾问
李一群 电通上海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林惠春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方汉伟 山西金海洋能源集团公司董事
叶齐茂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唐鑫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何君臣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俊凯 环球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王磊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聂晓阳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李晓明 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

上海世博会：中国发展新里程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a new milestone of China's Development

黄耀诚

●（上海世博局代表、世博会国内参展顾问）

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94年至1995年在复旦大学进修，并于次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讲学。1996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10月起任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中国以巨大的优势获得了世博会的举办权，当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当国际展览局的秘书长洛塞泰斯在一张请柬上写下“今天，世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希望”的时候；当法国一家主流媒体在评论中国获得世博会主办权时用了“众望所归，当之无愧”这样的标题的时候；当西班牙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把上海评选为“2002年世界最知名的城市”的时候；当波兰总统认为，“世界的文明中心已经开始向亚洲转移”的时候，我想，中国能够举办2010年世博会，是对她开放政策和经济现代化的奖励。中国一下子站到了世界聚焦的中心，也注定开启了一个不平凡、有意义的行程和探索。对于此，我谈四点想法：

第一，世博会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大平台。

上海世博会始终贯彻“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宗旨，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国在世博会的大舞台上挥洒自如的表现着自我。人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硬实力，而是文化软实力。美国耶鲁大学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写过一本书《帝国未来》，她提到“古代的罗马和现代的美国通过向全世界提供充满诱惑和魅力”的“文化商品”引起共鸣，这是维系“帝国地位”的主要秘诀。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在评论中国时讲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成功，而文化的成功还在未来。经济是两个文化之间理解的开始，文化是两个社会之间理解的基础。相互理解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没有相互之间的深刻理解，就没有成功的合作。世博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让不同民族文化能够相聚相会的条件。有了广泛的交流机会，让人们在交流中形成共识，在共识中引起共鸣，因共鸣而产生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共振，从而产生巨大的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上海世博园区，从精巧、多姿多彩的展馆设计到精心挑选的国宝式的展品布局，无一不是以文化为核心。两万多场娱乐演出活动，经典的、时尚的、传统的、大众的，统统汇聚在这个时段。它们除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满足人类对快乐的渴望和追求之外，其更深

层的含义是要把本国民族的魂、民族的根、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本地文化凸显出来，以获得世界更多的认同。文化盛则国家强，能够获得越多尊重的必定是厚重的文化。

第二，世博会向世界全景式的展示了中国的形象。

作为第一次举办综合类世博会的中国，将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元素太多，改革开放、发展、五千年的文明史、令世界心动的大市场、至善大爱的精神，众多的国宝级文物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理念、国际表述，中国元素，时尚表达，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以城市化改变中国为主线，在展示设计中体现中华的大智慧，在细节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以城市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来揭示矛盾和问题，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它的设计倡导一种理念，即理性的、宜居的城市布局和人居的模式，资源的良性循环，公众参与的城市管理，把城市作为富有生命的有机体，多形式、多方法地展现在人类面前。上海世博会跟其他世博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台港澳，都有一个展馆。除了一个国家馆之外，把各地的民族风情展现出来，让世界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整体形象。

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上海世博会



上海世博局代表黄耀诚介绍2010年世博会在展示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有两个创新：第一就是网上世博会。第二就是城市最佳实践区。50多个城市的案例将聚集在一个城市最佳实践区当中，即把这个城市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成功的、有效的、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案例聚集在一起，人们到这里就可以看到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城市未来人们生活的方式，这是一大创新。第二是网上世博会。除了实体世博会以外，另外用一个网上世博会让世博会的内容延伸拓展，我们称它为永不落幕的世博会。它是国际展览史上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对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有参展方以及未来国际展览事业都将有巨大的价值。

同时上海世博会还注重表达三大核心：在各个国家馆密集的地区体现人和人的和谐，在黄浦江的两岸体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在浦西以城市企业馆为最佳内容，体现历史、未来和现在的和谐。在选址设计上选在市中心、黄浦江两岸，体现了从城市改造的迫切需要出发；在建筑设计上则以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生态为核心；在景点设计上突出了艺术传承和艺术发展；在活动上体现了以民族、民间、民俗文化为重点。世博会向世界所要传递的信心是：第一，热情友善地对待朋友，实现合作共赢。第二，

坚定不移地提升自我，发展自我，让中国看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第三，非常负责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为社会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世博会为共度金融危机提供动力。

到目前为止，上海世博会已有192个国家，50个国际组织和17个企业确认参展。我可以自豪地说，上海世博会的参展规模和参展热情是前无古人，我不敢说后来者，但是我心里也在暗想，以后的历届世博会的参展规模可能超过不了中国世博会。

在整个世博会期间，考虑到主题的延伸，我们还专门有一个生命阳光馆，就是为残疾人设立的专门馆。它要从细节、从整个布局当中体现中国的人文关怀。今年我们召开了第三次参展方会议，818个国家代表聚集在一起，大家参展上海世博会为什么会这么热情？我们也在思考。那就是基于两个共识：第一个共识，发达国家认为上海世博会在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恰恰是树立形象、塑造品牌的极好机会，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爆发遇到了艰难，就让国家的形象逐步衰弱。第二个共识，发展中国家认为，正因为遇到了经济严寒，所以需要抱团取暖，而上海世博会恰恰是寻找一个合

作机会、克服困难、共度时艰的极好机会。这两个共识形成了这些参展方参与的热潮。我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数字印证这种热情——沙特阿拉伯将投入折合11亿元人民币以上，日本投入折合9.1亿元人民币，法国投入5千万欧元，美国6100万美元，韩国投入3200万美元，加拿大投入2400万加元，光中国香港一个馆（1100平方米）就投入3.5亿港元。大家就是要用这个舞台共同克服困难，和

平相处。

第四，世博会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

世博会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如何让民生更滋润；第二如何让发展可持续；第三如何让环境更优雅、让资源不枯竭。明年10月30号上海世博会将举办一个高峰论坛，并提出上海宣言，探讨如何善待我们自己的生活，善待地球。世博园区内交通零排放、生活垃圾全回收处理、太阳能、风能获得利用、土地修复、非电空调、冷源热泵、低能利用、阳光采集和两水收集利用，低碳技术应用等等都会实现，还有106万平方米的绿地。“绿色世博”的旗帜高高扬起，将进一步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世博会不是要给人类一个完整的结论，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形态、新的启示、新的方式，为人类的多样生活提供一些示范和新的思考，这就是上海世博会的根本要义。中国申博成功后的六年中，又有60个国家加入国际展览局，他们都是为世博会的功能和意义所吸引。

世博会，是社会进步的缩影，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演绎，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引领，是中国发展的新里程。🇨🇳

从世博会看人类社会发展新动力

World Expo and New Motive Force of Human Society

吴建民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前驻法国大使）

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第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学院教授。曾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1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2004年11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2007年11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副院长。2008年10月，当选亚欧科学院院士、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很高兴能够出席本次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

世博会越来越临近。我想讲三点看法：第一，世博会经久不衰的秘密在于它承载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1998年我到法国后开始介入世博会这项工作，2007年在离开法国时，12月份我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担任4年，之后担任名誉主席。在这期间，两次世博会，一次是在日本的爱知世博会，我担任评委。一次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世博会，我也担任评委。

担任评委时我对各个场馆看得比较细，上百个场馆，我大概看了两三遍。



吴建民在论坛上从历史的角度谈对上海世博会的期望



吴建民（右二）和与会嘉宾在现场交流

十几年介入世博会的过程中，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世博会这样一个活动，从1851年到现在，158年，经久不衰。人类历史上大的活动，能一百多年经久不衰的不多。什么原因？在整个过程中思考，跟国际展览局的人交换意见，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世博会经久不衰的秘密，它承载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

1851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几乎都是由世博会首先展现出来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东西，大概最早的都是在世博会当中展现出来。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世博会的另一个作用展现出来——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成果，也有问题。世博会把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提出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大阪世博会办得很成功，观众达6400万。大阪世博会的主题就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

1974年，美国斯波坎世博会的主题是“没有污染的进步”，因为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对环境造成了破坏。2005年日本爱知县的世博会主题是“大自然的智慧”。东方人很早就提出来人和自然和谐、天然合一，比如

像“鬼斧神工”这类词就反映了对大自然的尊敬，对大自然的规律不要违背。爱知世博会我看了三遍，办得非常好。它提出人类文明面临很大的问题。问题提出来了，怎么办呢？于是世博会第三个功能出来了——提出解决的办法。世博会上，那么多国家在一起，大家各自提出自己的办法，通过交流一定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每次世博会之后，它对创新都是有极大地促进。

第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非常好，非常契合时代潮流。1800年，全世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只占2.5%，现在是50%以上。21世纪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会是更多？有人估计是60%，甚至更多。城市应当如何建？城市里如果都是水泥铸成，夏天会形成热岛效应；城市的绿地都被侵占了，都盖了房子，人生活在这样空间里舒服吗？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到城市里面住住可以，可有了房子住，老在这样的环境里行吗？我到有些城市时发现，人行道没了，人行道变成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行人共走的地方。我这个年纪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都感到很不安全。你说这样建城市的理念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吗？

所以人们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对

上海世博会的期待是什么？我说我对上海世博会最大的期待就是把各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好经验向大家展示，同时也把他们面临的问题向大家说明。中国能够通过上海世博会博采各家之长，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将会提升；如果我们在城市化

方面做得更好，不仅对我们中国人是一件好事情，对世界也是一件好事情。

第三，三新。什么新？我认为人类社会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沿：新能源、新产业、新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来自何方？来自这三大革命。什么力量推动这三大革命前进？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全世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大家都讲中国在崛起，对，但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中国，亚洲、美洲、拉丁美洲都有一些国家在崛起。崛起之后马上就有一个问题，目前这种发展模式是工业化国家创造的，但美国人均年消耗8吨标准煤，美国消耗世界上25%的能源，中国人均只消耗一吨标准煤，如果都像美国那样，全世界的资源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够用啊。

第二股动力是气候变化。现在天天介绍，适应人类生存的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应该低于350PPM（百万分之350），现在已经突破380PPM了。所以必须要变。首先能源变，能源一变，带动产业变。有人说这将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中心，第二次是电，第三次是信息，这次是新能源。新能源一动，产业都动了。📺

友谊让城市更加美好

——21世纪城市外交的新活力

Friendships Make Cities More Beautiful

陈昊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

1942年生，四川乐至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系。2008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任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中俄友协会长，中欧协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今天能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十分高兴。上海世博会关注城市发展，全世界的目光因此都聚焦到了建设更美的城市和更好的生活之上。

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城市化进程。因此，城市的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是国家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不仅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提供了蓬勃的成长活力，而且还影响并参与了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过程。与城市相联手的国际合作，在国家的总体外交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它属于城市之间的交流，但和国家之间的交流是有关系的。同时，它又能够直接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市民，所以我说它是“上达中央、下及市民”，对推动国家和城市的全面进步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



陈昊苏在论坛上谈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外交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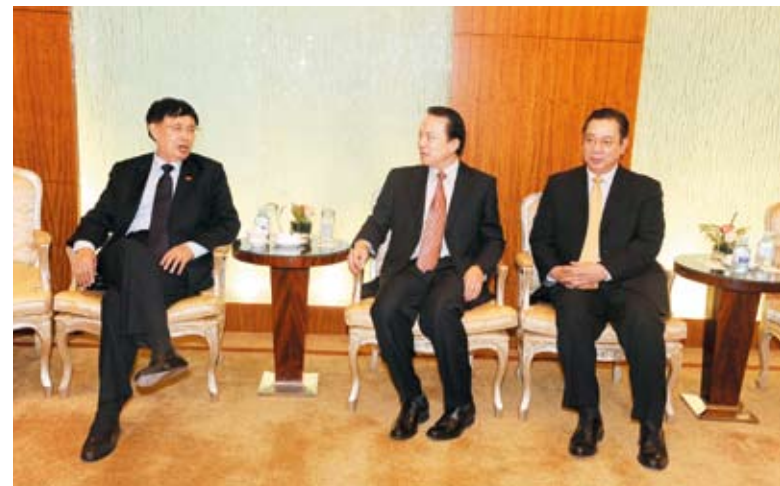
献。我所在的对外友协是由国务院授权的国际友好城市活动的主管机构，我们多年来的努力目标就是通过城市的国际合作为总体外交服务，通过城市外交的推进让我们的国家赢得更大发展。

为了配合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在上海举办2010年国际友城大会。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期，这为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更高的要求。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友好城市间应该加强接触与沟通，分享经验与教训，深化各层次各渠道的交流，以共同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召开国际友城大会的目的就在于此。

我想强调的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迅速，但同时面临着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挑战。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还有严重传染性疾病蔓延等全球性问题突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包括城市发展带来种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世界各国城市应通过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进一步加强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世界各国走出危机赢得发展贡献力量，同时进一步增进市民福祉，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我简单介绍一下城市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这一活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欧洲蓬勃展开，又传播到北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城市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古老的城市外交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在这里我多讲几句城市外交的历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中）、副社长周锡生（右一）与陈昊苏会长（左一）在大会开幕前交谈



陈昊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史：城市的诞生曾是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重要标志。城邦之间的交往、诸侯国的外交这些在本质上属于城市外交的范畴，构成了最早的外交形态。到了现代，作为地方政府的城市不再占据外交的中心位置，也不再负责处理国家关系中的重大课题，但它还是现代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可以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正是因为城市外交服从并服务于总体外交，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强调为城市的发展服务，把开展务实合作放在增进感情色彩并有所超越的重要位置

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数十年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还会赢得新的进步，城市外交的意义将更加引人注目。我对这项前途远大的事业充满自豪，我相信十年之后我们将看到一个繁荣、进步、和谐、安全的世界降临人间，到那时候我们回顾城市外交工作的成就，将能享受到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满足。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我曾表达过两项美好的祝愿：让友谊成为新世纪的时尚，让和平成为全世界的永久。今天，我把这两句话奉献给在座的所有朋友，谢谢你们的关注。🌹



小手川大助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课题

——应对经济危机之日本经验

State of Global Economy, its Challenges, and Japan's experiences

小手川大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代表、理事）

2007年起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本区执行主任。曾代表日本参与了各种国际谈判。曾任经合组织财政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并主导创建了该组织的税收竞争小组委员会。他还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金融经济学家和日本山形县的常务副长。精通英语，同时还会俄语和德语。

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新华社《环球》杂志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个论坛。

1993年到1996年，我非常不幸地经历了日本的经济危机。当时雷曼公司和贝尔斯登在日本都破产了，他们在三个星期内就完全垮掉。当时我是清偿银行的主管，同时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也是清算工作的负责人。当时日本成立了一个产业重振委员会，力图重新恢复

日本金融机构的活力，我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现在世界正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危机之前，经济发展非常好，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新兴国家也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增长在5—10%之间。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引发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下降的趋势，下降达1.1%，

而新兴国家的GDP下降了1.7%，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我到华盛顿履职，任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曾经经历过一次经济大萧条，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46.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5%，消费价格下跌24.4%，批发价格下降50%以上，股价也下降了73%，失业率达到25%。在去年9月份我们采取了一些对策，应对金融市场出现的恐慌，建立了一个安全网，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保护金融部门免受危机的进一步冲击。首先建立一个安全网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三个具体的对策：一是处理银行的不良债权，二是通过政府注资增强金融机构资本，三是保证银行间交易。

第二，实施这些政策。比如说增加政府注资来处理不良资产。第三，采取避免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恶性循环的一些措施。第四，讨论我们从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再度重演。如强化透明度和问责制，强化健全的管制等等。第五，建立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我看来，第四和第五并不是现在最紧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现在谈到的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官方。在美国，从经济情况来看，其房地产市场的下跌很快就会触底了。但它在金融方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是由不良贷款的累积造成的，需要在消除不良贷款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在欧洲，问题更严重。它的透明度和美国相比更差一些，在中欧和东欧也有一个巨大的泡沫。我们看到，由于资金流的迅速转向，冰岛整个政府金融体系“破产”了。波罗的海国家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们无力

偿还银行贷款。

而保加利亚、乌克兰这些国家也会相应受到影响。瑞士的银行已经受到了证券化资产的负面影响，其房地产等市场遭到了重创。今年《金融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还预测了英国的金融情况，并声称今年年底英国就要向IMF申请援助了。

金融领域方面，第一，我们必须查明损失的额度，运用准确的会计准则，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要对银行资产进行例行的审查，审查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把有问题的资产转移到特别设立的银行进行处理。而金融体系的问题也会传播到实体经济，比如说人力资源等方面。所以政府和企业都要联手采取措施。更关键的是政府要进行监管，否则银行本身是不会作出诚实报告的。

房地产有过度的贷款，泡沫一旦破灭，他们有大量的贷款要偿还。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话，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恶化，而政府支出是阻止这个局面的唯一的手段。下一步就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在上世纪90年代末，

日本被要求承担起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当时日本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是10%，而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达到35%，日本是美国和欧洲加起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新的世纪，世界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发达国家，而美国和欧洲加起来是四分之一，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在未来几年继续撑起这25%。新兴国家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增长。“金砖四国”则贡献了一半，尤其是中国，中国贡献率是很大的。

国际市场现在处于很困难的境地，现在市场的参与者大大减少，在主要的同行破产以后，很少有金融机构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参与市场，石油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此同时，很多大银行仍然有毒资产，他们必须用一定的折率来重新衡量、出售这些资产。因此，我们就需要有良好的监管，否则一些投机商就会在市场中制造混乱，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而在日本，也就是十年前，我们对有毒资产的折率是90%，也就是说我们在出售这些资产的时候，只能卖出其票面价值10%的价钱。📌

小手川大助理事与与会外宾在论坛结束后的交流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与东亚

Global Economy and East-Asia after Financial Crisis

杉本和行

●（日本财务省顾问、前财务省事务次官）

前财务省财务事务次官。197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同年进入大藏省（现财务省）。1988年任日本驻欧共体一等书记官。历任大藏省课长、主计局主计官、总理秘书、大臣官方长、主计局长、事务次官。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环球国际论坛。我曾经担任过财务省的财务次官，一直到今年7月份我还在日本政府任职，主要负责国内政策的协调，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协调。我今天想讨论一下在雷曼公司倒闭之后的国际经济形势，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首先，我想就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做一个概述。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如今已经过去一年零一个月，由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负面、恶性的连锁效应，最终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局势，这一点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吧。在这种形势之下，世界各国政府

积极应对，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从政策层面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国际形势上来看，过去的八国峰会扩大到20国集团峰会。G20国集团的首脑会议第一届于去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届于今年4月在伦敦召开，第三届是9月分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这个峰会将成为今后我们对世界经济、金融进行国际协商时的一个新核心。

在G20的峰会上，各国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在国际协调的基础之上，在金融、财政等领域各自采取措施。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各国政府，在金融财政方面大胆推行了一些措施，使得曾经一度暴露在系统性风险之下、濒临危机的金融市场，从恐慌中逐渐走向好转。而曾一度衰退的世界经济，由于各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方面的补救，最终也避免了出现最坏的局面。世界经济的这种转变中，中国政府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政策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过，世界经济目前呈现的复苏过程还不稳固，尤其是就业形势的恶化，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因此，目前对世界经济来说，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国际性的政策协调，仍然非常重要。在世界经济彻底恢复之前，仍然需要继续实行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

为了让世界经济发展过渡到一个均衡发展的模式，各国之间进行政策上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金融危机之后，为形成新的世界经济结构构建起一个发展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后世界经济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在不过多依赖美国消费以及金融业的过度冒险下寻求发展。为此，必须实施改革。

为了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结构，我有两个大的观点：

首先，我们应该把亚洲，尤其是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发展潜力。

第二，要积极的应对能源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

从金融危机以后的局面来看，东亚经济的复苏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力度最大的。亚洲特别是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如果充分发挥其潜力，这不仅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日本经济。1968年，日本的名义GDP超过了当时的西德位居世界第二，而那一年刚好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69年大阪世博会之间的一年，如今已经过去40年了。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想大概也就



杉本和行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在这一、两年，即北京奥运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即将举办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的名义GDP将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和日本两国的GDP加起来约占世界的1/6，如果加上韩国和东盟，将占整个世界1/5。我们应该把整个亚洲看作是一个内需大市场，去思考如何构建起一个全亚洲的供应链。

在加强全亚洲联系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必要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说，要推进达成覆盖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此首先必须推进日韩三国之间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另外，还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亚洲统一的债券市场，要发挥亚洲的潜力，发挥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日中两国相互合作，携手共进。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大家都知道日本9月份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政权体系的更迭。

日本新首相刚上任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日本将在主要排放国积极参加减排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到2020年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25%。应对气候变化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如果没有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那就毫无意义。光靠日本提出一个高目标，我认为是不可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要依靠世界上所有排放国架构一个公平的、有实效的框架，这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

日本政府有一个叫“清凉地球伙伴关系”的项目，通过它去支援对气候变化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以及一些岛国等等，帮助它们去适应气候变化，同时支援发展中国家通过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缓和全球变暖程度的目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表明，为了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将密切关注国际间谈判的进展情况，一如既往的甚至更进一步的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

为了解决地球环境问题，需要将消耗传统能源逐渐转向电动车或者太阳能等不产生二氧化碳的新能源形式上去。日本的单位GDP能耗水平之低是世界领先的，我们国家的这些技术可以转让给其他的主要排放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领域上我们是有可能进行合作的。举个例子，中国发电量有80%是靠燃煤提供的，而日本煤炭发电的技术是世界最先进的。据估算，如果把日本的这个技术应用到中国的煤炭发电上，那么中国煤炭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将削减30%左右，同时可以大量削减烟尘、煤尘、硫化物等等。

今后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既要保护环境又要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日中两国也一定能够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关系。我也衷心的希望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能够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环境能源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谢谢大家。🌱

一的、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在全市范围内做出划分，哪些地方是居民生活区域，哪些地方是工业区，哪些地方是商贸区，哪些地方是休闲区，哪些地方是生态区，降低市区过高人口密度，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要发展大容量公共交通，包括高速轨道交通，形成一个半小时的、快捷的生活圈。

3、上海住宅业的发展，应当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为目标。我们国家的土地有限，我们搞住宅业的目的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有自己适合的住宅，住宅不应当成为投资品，不应当成为炒作对象，不应当成为“第二个股市”。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吸取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教训。在日本、香港，房地产价格被炒得非常高，现在他们已经尝到苦果了。我们应当向德国、荷兰学习，我到这两个地方考察过，德国和荷兰的房价，50 年几乎没什么变化，通过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促进了整个大市场的稳定，进而保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

第三，要以世博会所展示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来激发中国人的自主创新精神，建设创新型国家。世博会是各国生产技术和创新智慧的集中展现，它将引导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人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的最好机会。通过世博会我们来学习先进技术，加大自主创新投入的力度，形成一个良好的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人才济济，各类的科研院所、大学非常密集，好多企业也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怎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我们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向深圳学习，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城市，我想这是需要我们一起思考的。📍



郑新立针对如何利用世博会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发表演讲

第二，世博会提倡新环境的理念，来创造一个宜居的城市。

1、推动服务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和社区服务的发展。中国的服务业长期滞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到去年我们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只有 39%，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 34%，这个水平太低了。在日本、美国，这样的比例都在 70% 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 40% 以上。印度人均 GDP 比我们少，但是印度的这两个比例也接近 50%，所以我们这两个比

例低于 40%，太说不过去了。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社区服务，会计、审计、咨询、物流等等这些为生产服务的新型服务业的发展，我想世博会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2、通过优化城市布局，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就上海来讲，一是要降低市区人口的密度。我过去到上海做过调查，那个南市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那么有限的地皮上住了那么多人，根本无从考虑什么生活质量。现在，我们应该考虑怎么能够通过搞一个全市统

“世博周期”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Cycle of Expo and Tendency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45 年生，河南唐河县人。1945 年 2 月生，经济学硕士，研究员，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2009 年 4 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今年是中国人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率先回升的一年，是中国的宏观调控经受住了重大考验的一年。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回升的态势已经形成，全年实现年初确定的发展目标已成定局。但是目前这种回升态势，还是脆弱的，是不巩固、不稳定、不协调的。为了使国民经济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走上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我们的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命题是在前年的中国共产党第 17 次代表大会上里面提出来的，它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转变需求结构，着重扩大消费，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局面；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增长的局面；

三、调整要素结构，着力依靠自主创新，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局面。

明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可以说为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够把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变成机遇。把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压力，变成我们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真正走上科学发展轨道。我想，至少要从三个方面来发挥世博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作用。

第一、以世博会所倡导的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来推动消费方式的转变。这里面第一就是要提高消费率，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提高居民消费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我最近计算了一下，去年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即 45%。如果提高 10 个点，恢复到十年以前的水平，达到 55%，我想这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是居民消费率，去年已经降到 35%，也

是历史最低点，我们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把它提高 15 个百分点到 50%，也是可以做到的，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 1985 年的 52%。

如果实现了这两个提高，那么老百姓的收入将会有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我们的消费水平也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城乡居民消费率能够提高 15 个百分点，那么我们一年增加的消费额就可以达到四万到五万亿元。我们说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如果国民消费水平提高这么大的一个幅度，以人为本可以说算是得到了最大的落实。

另外，我们借助于世博会所倡导的健康消费的理念，要鼓励健康消费，发展型消费，用消费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我们提倡节约型消费，摒弃攀比性、炫耀性的消费。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现在奢侈品的消费总额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是世界第一位。按照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我想可能要不几年，中国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日本、美国人均 GDP 四万多美元，我们才刚刚超过一万美元，我们怎么跟人家比？所以还要提倡集约型消费，健康的生活方式。



周牧之



朱中一



陈 淮



胡存智



吴文化



斋藤圭介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 • 新生活分论坛

新生活：寻找城市发展的平衡点

New Life: Seeking Bal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主持人：

● 周牧之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经济学博士，知名城市化问题专家。《环球》杂志专栏作者。历任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国际开发中心研究员主任研究员，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曾供职于国家机械工业部。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论——崛起的机制与课题》、《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机械电子革命与新国际分工体系——现代世界经济中的亚洲工业化》、《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等。

讨论嘉宾：

● 胡存智

广东省兴宁市人，环境地学硕士，1978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任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2008 年 12 月任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经济分会会长，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 陈 淮

1987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3 年获研究员职称，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 朱中一

1944 年 12 月生，1967 年 7 月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2006 年 4 月起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1 年 5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建设部体改法规司、政策法规司任副司长、巡视员兼副司长。2006 年 4 月到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后，还兼任产业与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研究中国房地产产业政策、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发展趋势和中国百强企业的研究等。

● 吴文化

经济学硕士。现为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运输经济、交通政策分析、城市交通、交通能源与环境研究专家。一直从事综合运输的研究与咨询工作，主要从事运输经济、交通政策与管理咨询、交通运输规划、交通投资项目评估、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分析等领域的科研工作。近年来专注于城市交通、交通物流和交通能源利用效率等领域的研究与咨询。

● 斋藤圭介

日本资源能源厅节能·新能源部长。1983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同年进入通商产业省。2002 年任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2005 年回经济产业省任产业再生课长等职。

周牧之：



十年前也是由国家发改委和日本政府合作的关于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大型研究项目，几十个专家做了好几年，就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该怎么制定，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等做了非常概括性的政策建议。

十年前那场报告会的主报告人是我做的，因为我有幸是那一次调研的总负责人，今天新能源分论坛主持人的杜平先生是中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记得当时国内的城市化还在推崇小城镇道路。在那个主报告中，我们谈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讲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它注定中国今后城市空间的主体具有“高密度、大规模”的属性。所以中国应该走以大城市、大城市群为主体、为主流、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当然这并不排除小城镇的建设。这是我们的主体思路。

第二，正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属性今后是“大规模、高密度”的，对未来的汽车社会可能带来冲击，中国应该提前做准备。中国需要提前做政策和规划应对，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骼的城市交通体系，支撑起“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化社会。我们在昆仑饭店开完会后，在广东、上海开了多次大型的汇报会，大城市群的概念后来慢慢被中国政府接受。在“十一五”中，政府明确提出了大城市群战略。

中国走不了美国人汽车加大房的模式，为此我们呼吁就中国的城市生活模式需要进行社会性的探讨。可是，关于未来中国生活模式的探讨后来在国内一直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也没有太多舆论关注。

但是十年下来，我们发现，过去的 10 年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爆发期，这个总爆发不仅体现了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 GDP 总量的扩大，不仅因为我们产业做大做强了，它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生活形态。这个改变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最大、最快的。而这个改变就发生在过去的十年间。

首先是住房改革，接着是汽车普及，这两个事引发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汽车、房子在十年前对于大家来说还都是梦想，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梦想成真。房地产和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与土地和房地产业有关的收入现在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最大的财源之一而与房地产、汽车相关的信贷，则成了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个最重要金矿。这些看上去好像是大家都赢了，是一个共赢局面。但是实际上呢？对于老百姓来讲，房子越盖越远，越炒越贵，“天价房”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汽车虽然越来越便宜，但是堵车、大气污染、车祸，长时间的通行时间造成的生活不方便，使得城市人的幸福指数在很多调研中反而下降了。

这就是说，10 年前我们的警告不幸变成了现实，而且是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变成了现实。今天的论坛上我们有搞房地产政策的专家，有搞轨道交通政策和搞能源环境政策的学者，我们将和这些政策专家们在一起回顾一下我们 10 年来走过的路，讨论我们的城市今后应该寻求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

今天的分论坛，我们先请每个专家做 8 分钟左右的阐述，然后我会给专家们提问题，接下来是台上、台下的互动。这一次我们还有幸请来很多日本政府的高层决策人，我也会请他们贡献一些感想和建议。

朱中一：



对于中国房地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我想谈6点意见。

第一，城镇化一定要跟当地的社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考虑当地有没有产业支撑，第二当地能不能提供就业岗位。

在一些地方，当地政府想让房地产发展的更快一点，但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想快也难。但是在另外一些流动人口量很大的地方，比如像深圳、东莞，流动人口多于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那里的打工的人一走，房地产市场就冷下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快的时候，它的房地产市场增长又很快。为什么说像深圳、东莞这样的城市房地产业起伏波浪比较大，这跟其城镇化程度有关系，跟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关系。

第二，要促进城镇化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定要跟房地产的发展和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同步规划，最好要同步建设。现在的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尽管注重了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但是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依然跟不上。

第三，怎么保持合理的房地产开发规模。从 2001 年以来，我们房地产开发规模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般在 20% 以上，以后可能也要保持一段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凸显以后，可能开发规模会越来越小，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各地要处理好的。另外还要处理好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关系，地上开发和地下空间利用的关系，城市的新增用地和存量用地的盘活关系这些问题。

第四，从住房角度来看，既要加强住房保障，也要培育和规范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人群住房需求，这就牵扯到住房保障和市场协调发展问题。

第五，怎么要坚持合理用地的原则，又要依据城市的建设要求来建设城市，来开发项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国家现在提倡了发展环保型的项目，改善人居环境，来提高住宅的使用寿命，这要大大加强，这关系到我们行业的转型和行业的生机问题。

第六，房地产项目里头的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工业地产、办公楼、写字楼等，也应该跟住宅项目一样，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

周牧之：



刚才朱中一副会长谈了很多关于中国房地产的问题，让大家对为什么中国房价涨这么快，涨这么猛，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的房价都在跌，只有中国房价在涨，而且涨幅还不小，等这些现象有了一个深入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有请陈淮主任。

陈淮：



21 世纪初影响全世界经济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互联网，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能够把全球经济带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率先开发出增量需求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 13 亿人从乡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产生需求，是对全球、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四个尖锐问题：

第一，城市的改造。1990 年，中国城市城镇实有住房建筑面积 20 亿平方米，2008 年末城镇实有住房面积 124 亿平方米，我们用了不到 20 年时间，使得城镇实有住房面积存量资源总量达到初始阶段的 6 倍。但是我们有 6.07 亿城镇人口，到 2008 年末，人均住房面积不过 20 平米，户均不过 60 平米，也就是刚刚走过脱困的初级阶段。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住房当中有一半是要在未来 15 年左右的周期中拆了重建的。

中国人的宜居二字中的这个“居”字，包含了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太多的不值钱、破乱的“遗产”。1949 年建国之前的房子不用说；1949 年到 1979 年这 30 年，我们所谓的棚户区改造，留下的主要是 50 年代建的工农新村，延续而来的棚户区也都是些劈柴房；我们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 20 年中，只建一些过渡房，因为那时候主导思想是要准备打仗，打完仗再建设。我们真正能够有一定保留价值是 1979 年到 1999 年建的房子，建成这些房子标志着中国老百姓真正走出住房危机困境的第一步，但是这些房子再有十几年也就到了 30 到 40 年房龄，也需要改造。人们能够称之为比较现代化城市的住宅就是 99 年以后建的，宜居之“居”首先要面临的的就是城市要改造，要大规模的拆和改。

第二，中国城市必须解决减灾防灾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城市地貌，可以建得不亚于世界一流国际化大都市，但是他们的地下管网、交通基础设施，无一例外的都在危机的边缘运行着，包括开完奥运会的北京，和就要开世博会的上海，和正在开全运会的济南。仅仅在前年，济南下了一场 40 分钟的急雨，城市街道上淤积的水就淹死了 32 个人。今年从 5 月到 8 月，从南到北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主要街道都成了“河流”，甚至能划船。城市的减灾防灾建设迫在眉睫，这是宜居之“居”的第二条。

第三，我们得解决城乡接合部的那些居民的居住问题，包括小产权问题，农民的出租屋问题，城中村问题。光北京一个城市，住在这样的农民出租屋中的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就有 200 万之多。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在讨论城市宜居性的时候，把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体遗忘在外，用不了 20 年，他们就会发展成城市中非常难办的“癌症贫民窟”。

第四，我们得解决现在已经在城市中经商、务工的 1.4 亿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的居住问题。一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向城市聚集的农民工，原来只能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沿海特大城市和贵州山区的贫困农村两极之间摆动，而没有任何中间层次的城市可以缓冲和承接。

周牧之：



谢谢陈主任为我们梳理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提到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进城的问题。在日本有一类歌叫演歌，在战后很流行，唱的是离家远行的人的乡愁，对家乡女人的思念，对家乡父母的眷恋，家乡的酒，我把它定义成是日本“农民工”的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从农村进入了城市，这就是演歌当时大流行产生的背景。听演歌的你会感觉到，歌里有乡愁和思念，但却没有怨恨和不满，只有思念。这说明日本成功地很快把这部分人口吸收、融入到了城市。

刚才陈主任讲到北京有 200 万流动人口，朱副会长才提到的广东东莞有 500 万人的流动人口。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给城市的软硬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我们很多城市的规划，实际上都是在没有考虑部分人口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接下来请斋藤先生和胡存智总规划师做陈述。斋藤先生是北京市的环境顾问。

斋藤圭介：



我想先谈一谈关于水资源问题的一点看法。我 2002 年的时候在北京工作，当时有很多产业都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在内陆地区一个单位水资源所产出的 GDP 比农业要高的多，所以很多水资源都用于工业用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使用水，排水、废水又怎么样处理，这对每一个城市，包括城市周围的地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的工作是研究城市的能源问题。日本有很多很大的发电站，还可以看到一些分散型的电源在使用，即每个地区发的电在各个地区使用。日本的新能源利用，比如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或者是电池电动车，虽然规模非常小，但我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而要作为一种城市能源利用体系的一部分来考虑。

另外，太阳能或者风力，它们可以发电，但稳定性得不到保证。怎么样去保证这种稳定性？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在城市当中，住宅和运输这两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日本 1973 年出现石油危机以后，一直到现在运输方面并没有多少增长，能源增长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怎么把握城市能源的需求，这些也非常重要。

吴文化：



2008 年末全国城市建城区的面积达到了 3.63 万平方公里，大概比 2000 年增长了一倍。另外城市人口密度在 2008 年的时候达到 2080 个人每平方公里，这是 2000

年的 4.4 倍，也就是城市的规模在扩张，人口密度在增加。这是对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判断。其二，机动化快速发展所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巨大挑战。实际上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是全球大城市的一个通病。我们可以看一些印证中国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的数据——2008 年末，全国民营保有量达到 5100 万辆，这里面还不算没有纳入统计的，比如所谓的农用车（大概一千多万辆），另外还有大量一亿台以上的摩托车（摩托车作为一种机动化交通工具的使用主要在农村）。

在这 5100 万辆汽车保有量当中，载客汽车大概是 3840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达到 3500 万辆。从 2000 年到 2008 年，私人汽车保有量年均增长 24%，基本上三年翻一番。2000 年是 1600 多万辆，现在到了 3000 多万辆。大概到 11 月 14 号，中国生产的第一千万辆小汽车将下线，也就是说，中国 2009 年注定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总量超过美国。

在北京，现在是 380 万辆的机动车，到明年 2 月份将达到 400 万辆，从 300 万辆到 400 万辆，只用了两年多一点，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中国人从收入上来讲，汽车主要是城市人口的消费品。据我们所估计，特别是在私人小汽车这一块，大概有 70% 到 80% 的汽车是在城市群的城际之间或者城郊里活动。所以，在中国，城市是汽车的主要使用区域。另外，由于过去没有想到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这么快，结果我们在做城市交通设施的规划上没有考虑机动汽车问题。所以导致现在的城市混合交通，加剧了城市道路的拥挤，像机动车、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都在争夺道路资源。

第四，小汽车和道路机动车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严重安全问题，能源消耗问题和排放问题。中国现在每年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是七万多人，最高的时候达十万人，比全世界每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都多。

城市轨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重要途径。

1、轨道交通是一种绿色的交通方式，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它运量大，能耗低，污染小，安全可靠。

2、相对于我们国家超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轨道交通的发展实际上是滞后了，我们现在处于

一种“补课式”的发展阶段。北京的地铁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建，中间停顿了 30 多年才开始继续建；上海也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开始建地铁，广州就更晚，我们在轨道交通这方面发展实际上是慢了，并不是快了。

国务院在 2003 年的时候颁布了一个第 81 号文件，这个文件现在还适用，它对修建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的审批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个城市如果要申请修建地铁，要求它的 GDP 要达到一千亿元，人口三百万以上，一般性预算收入是 100 亿元；申请修建轻轨的，城市 GDP 需达到 600 亿元，人口规模在 150 万以上，一般性预算是在 60 亿元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在 200 万以上的城市有 40 多个，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很多都超过“过了线”，早就达到修建地铁或者是轻轨的标准。

另外，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对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引导城市空间布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作用。

总之，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对较成熟的轨道交通技术，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应该说是方兴未艾。

周牧之：



谢谢吴所长，吴所长给我们讲了一个突然成为汽车大国的中国面临的很多苦恼。另外也讲了在中国，轨道交通建设并非一些媒体所说的是“一哄而上”，而是建得晚了，建得还不够。接下来有请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先生。

胡存智：



结合新一轮到2020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建好宜居城市，我们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增加城市绿色及开敞空间。具体说，就是对每一个地块，我们希望都能够鼓励它减少密度，因为一个城市承载人居住的这个能力还是不能减少的。

第二，要主动的、有意识的用一些绿带、农田、水面，将城市分割成为不同的部分，就是在保持它的基本功能不变的情况下，使之形成比较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

第三，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一些能够用快速交通连接的一些组团，以轨道交通或者其他一些快速交通相链接。基本形成一个大城市、中等城市周边带动一批小城镇的这么一个格局。

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够形成宜居的城市环境，如果缺少这三个方面，应该说比较困难，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次论坛提到一个问题，国内房价在快速的冲高以后遇到金融危机有一个回落，但是最近又有升高。我只想提示大家注意一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上半年，在各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房价的变化呢？只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大家仔细想一想，土地条件没有变，建筑条件没有变，其他条件没有变，房价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拐点下落？然后又到了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大概春节以后这段时间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回升，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原因是金融条件变了。

但从长远上来说，影响房价的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1、提供更多的房屋和土地，直到中国的人口高峰期结束，或者说到城镇化进程基本达到 60% 到 70% 左右，这个时候可能是房屋价格比较稳定的时期，最终解决问题是靠这个。这个时期离现在的时间也不是很远，2020 年最多到 2030 年，中国人口的高峰期就到了。那么在这个期间由于城镇化的进程，人口会继续向城市集中，根据有关方面的数字测算，平均一年有 1500 万人进入城镇，相应的不要说提供 1500 万人的住房，起码也要提供一半以上的住房，如果这个都达不到的话，那么房价就还要有一段时间面临比较大的上升压力。提供更多的房屋，特别是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更是当务之急。

2、要增设不动产税，最好也考虑遗产税，减少单纯的投资性购房需求。当然，不动产税不是要使得大家不敢买房，而是说驱除单纯的投资性购房。

3、要完善并更多的推出经济适用住房，这是坚定不移的一条道路。这个是解决那部分希望购房但是收入又比较低一些的人群的住房需要的。经济适用房应该有它严格的入市条件，同时要保证它确实是卖给了低收入阶层。

交通问题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领域，但是我也谈三点看法：

1、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以快速的轨道交通，把城市核心区或者是主城区的人群，适当的疏散到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像日本那样，这样才有可能解决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在选择地铁或者轻轨的时候，应该更多注重轻轨，而不是完全是地铁，因为地铁修建的成本比较高。

2、改变交通的组织方式。在这方面，目前中国跟一些交通组织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有些国内城市在组织交通的时候，甚至是有意的让各种交通形式不要衔接起来，如公共汽车和铁路最好不要直接连在一起，

因为这样可以有一个空间来疏散人群等等。实际上这种组织理念是不太对的，造成公交和铁路不能衔接，公交和机场不能衔接，铁路和机场不能衔接等等，甚至仅差最后一、两米就是衔接不起来。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的城市中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最近在探索一个新的交通用地组织方式，是最近在深圳以一个公司为主提出来，现在一些城市开始试验。目前我们的交通组织中，凡是交通拥挤，人群不好疏散的地方，就把汽车放到城市的第二层去，放到天空上走立交桥，让人群继续在路上走。而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是反过来。当交通流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车混流情况不好解决的时候，就把人群放到空中上去行走，让车继续在地上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实行人车分流。在北京的西单已经有这种初步的模式。在香港的 CBD 地区，中环地区，就是这种组织方式，把人群放到空中，把车流全部放在地下。

楠正刚



（日本国土交通省顾问、前国土交通省国土交通审议官）

日本的东京奥运会是 1964 年举办的，1970 年举办了世博会。东京奥运会之前的 10 年，也就是 1954 年到 1964 年的地价，已经涨了 10 倍。1970 年世博之后，在 20 年之间这个地价又涨了 10 倍。

日本在 70 年代的时候，制定了一个《城市开发法》，区分了一些可以建房的地区和不可以建房的地区。我觉得合理的房价一般是个人年收的 5 倍和 6 倍，如果超过了这个比例的话，一般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饭原一树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理事、前防卫省经理装备局长）

去过东京的人都知道，那里坐地铁到哪儿都行，久而久之，年轻人逐渐对汽车失去了兴趣。住在城市的人不是那么需要汽车了，除非是周六、周日开车到郊区去玩，因此城市里也没有必要花这么大本成本在小区里建停车场。另外，过去城市有很多工厂，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工厂搬到中国或者是到日本的乡下去了，过去有工厂的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楼，原来为去城里做工而在郊区产生的住宅需求也就没那么强烈了。

杉本和行



（日本财务省顾问、前财务省财务事务次官）

以日本为例，我们看到地方上希望有飞机，有机场，有高速，或者是有新干线，或者有新的轨道交通等等。但是，当从国家整体的这个观点去考虑的话，你不能只是听取地方的意见，如果是只听取地方的意见去完善这些基础设施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你必须从整体大局去制定一个整体的计划。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展非常快，肯定也会受到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等的限制，我们考虑今后城市化的进程，要从一个整体的、大的角度去思考，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周牧之：



我想在这次分论坛结束的时候讲两点感想。

第一，今天的台上台下交流，提问的大部分是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已经看到，在媒体和政策制定专家的讨论中，无论是

话语方式也好，语境也好，用词也好，存在着蛮大的隔阂。问题在哪里？我估计双方都有责任。我想，由环球杂志社出来办这个论坛，促进媒体和政策层面的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最后与老百姓沟通的是媒体，如果媒体和政策层面互相之间对话隔阂大，那么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多误会。这次论坛为沟通媒体和政策层面创造了一个好的平台。第二点，我觉得今天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在住房这块，特别是房价，对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几乎没有提问。这多少说明，大家还偏向关注眼前的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交通问题更是跟住房问题、跟环境问题息息相关，大家对它们的关注度还不够。所以我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交通，关注环境，只有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才会改善得更好，改善的方向和路径更正确。

过去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最大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房子，一个是车子。这两个要素把中国城市的面貌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把我们城市的生活也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可以这么讲，这是有史以来三千也好，五千年也好，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生活形态改变得最快、最猛烈的一次。再接下来的十年，除了房子、车子之外，我希望再加一个轨道交通，这三大要素未来将怎样改变我们城市的生活，改变我们城市的面貌？对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都将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吕斌



秦大河



贾峰



邵益生



李崑



李波



闫丘露薇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 • 新环境分论坛

新环境：未来城市的“绿色竞争力” New Environment: “Green Competence” of Cities in the Future

主持人：

● 吕斌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现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设计、社区规划与环境设计的研究、教学和规划设计及旅游规划、城市和区域开发项目策划。

讨论嘉宾：

● 秦大河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6月获第五十三届国际气象组织(IMO)奖。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9月连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长期从事冰川和极地研究，多次组织南、北极和亚洲腹地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考察，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

● 贾峰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副司长。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教育委员会委员、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理事、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环境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美国华盛顿大学汉弗莱高级访问学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环境科学中心。

● 邵益生

1958年1月生，浙江江山人，博士。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主任，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李崑

广西苍梧人，1953年11月出生，1969年9月参加工作，民革成员。现任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

● 李波

1968年生，祖籍云南大理，白族。2001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学院自然资源系资源管理硕士学位。2006-2008年在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曼谷亚洲办公室任湄公河可持续发展项目兼职研究员，国际保护联盟环境、经济社会政策委员会执委委员及权利、公平和治理议题的项目协调人。2009年-至今自然之友总干事。

● 闫丘露薇

凤凰卫视记者、知名主持人、战地记者，《环球》杂志专栏作者。

吕斌：



上海世博会是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以来的首届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这样的主题充满了激情和魅力，上海世博会在试图展示全球城市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还将让我们体验一个充满绿色的城市未来。

谈到绿色，近年来我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伴随生态环境的日益全球化，国家间、城市间的竞争，已经呈现出浓烈的绿色背景。绿色已经成为城市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改变单纯的以GDP水平考量城市的体系，而应该在这个体系中导入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高效的交通，废弃物的安全处置等等一系列环境指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世博会告诉我们，绿色的环境将成为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终极追求，未来城市的竞争将是绿色的竞争。今天，我们在这里请我们国内，甚至在国外非常著名的各方面的专家和主管部门的专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期待各位专家、嘉宾精彩的发言！

秦大河：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论坛！

当前最热的话题是什么？全球变暖！我这里有几个数据，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活动，使得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度。而到2100年，据测算全球地表温度要上升1.1~6.4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间，是因为它取决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变化。

这个结果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20年连续不断的研究得到的。即便如此，关于气候变化的判断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们正在做的就是设法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并给出应对气候变暖的科学建议。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的安全、防灾减灾。比如今年台湾遭遇的风灾，在台南造成了巨大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再比如，雷电在中国自然灾害中其死亡率名列第三，平均每年致死五六百人；

暴雨每年造成七八百人死亡。雷电还会造成供电中的自动控制失灵、供水中断等等这些连带灾害，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政治影响。城市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下的灾害性气候的影响，不仅是气象部门，也是各种防灾减灾部门的课题。

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责任重大。目前全球有65亿人，32亿人住在城市，占了一半。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数量、人口都在增加。估计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200万人以上的城市将达到59个，长三角等地区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之一。城市的人口密集、经济社会活动密集，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不处理好城市的环境问题，将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06年美国的克林顿基金成立了全球40个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联盟；欧盟2009年2月，400多个城市的市长签署协议，将带领各自城市成为欧洲减排的先锋；伦敦在2007年2月由市长签字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东京、米兰等城市也有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有没有动作呢？中国的上海市也在积极的应对，有以下几点：

1. 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相关的立法。
2.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编制。
3.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4. 探索推进低碳经济试点。
5. 进行分能，资源普查。
6. 开展灾害气候早期预警。
7. 大力推进城市绿化，改善城市气候。
8. 加强气候变化的进一步研究工作。
9. 开展各类环境的宣传活动。

我个人有几个建议。

1. 大力推进以绿色经济、低碳发展为标准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2. 积极推进以灾害应对为主体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绿色

建设。有一句俗话“再富有，一场自然灾害或者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就会让你退回到石器年代”。

3.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大力开展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展示、推介、论坛等科普宣传活动，使得我们整个民族都能够认识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给城市人带来的影响。

李波：



非常荣幸今天受到邀请参加这个论坛，我想环保民间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就10多年。10多年前，我参加到在中国西部扶贫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当中，跟那个时候比较，今天我能够收到这样的邀请来到这样的场面，跟官员、跟我们的专家一起对话，这本身说明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是今年1月份接任自然之友总干事的职位，这是一个有着15年历史的会员制环保组织，有一万多会员。

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的城市生活在这种经济的环境下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我们的城市生活变的越来越条块分割，绿色的空间变的越来越少，我们的下一代对农业，对食物的来源，对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陌生。曾经有一个专家说过，“我们下一代是没有根的一代”，因为他们以为粮食是从超市里来的，水是从水龙头里面来的。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知道粮食的来源，他们怎样成为有环境意识、忧患意识的下一代公民？这是城市发展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公共交通。城市越来越大，公共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在道路使用上，基本上私车是优先的，像自行车这样一种中国城市非常骄傲的低碳交通工具却使用得越来越少。我前一段时间去杭州出差，发现杭州政府非常高瞻远瞩的提出一种“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想法。杭州市设立了一种公共自行车交换系统，大家从家里出来以后可以很快的拿到一辆自行车，只花五六分钟就骑到了公交车站，下了公共汽车后又拿到自行车，很方便的骑到目的地。杭州的这个创新使我感到非常受鼓舞。我们很多的大都市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骑车上下班的人面临一个非常窘迫的情景——自行车的车道被机动车道占用的越来越多。如何在私家车和公共交通保持一个平衡？让自行车有一个位置？让公共系统真正变得安全、舒适、快捷？这是我们考虑低碳生活的一个方向。

第三，城市的垃圾处理。我们国家城市目前以垃圾的后端处理为主的模式是值得商榷的，而在前端处理这方面投入

不足。我们应该关注产品从生产过程到其之后整个的生命周期如何无害化、循环化的问题。同时，真正地让垃圾的减量成为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低碳社会，公民应该怎样行动？公民不应该是低碳社会被动的接受者和等待者，我们应该是参与者、呼吁者和监督者。我们自然之友就此做了两件事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低碳家庭，我们在全中国选择100个社区并和两个在线的媒体合作，通过在这100个家庭里仔细核算其各种电器的用电量，找出他们能源使用的模式，发现里面最短的这个“板”（最不环保的那个），通过媒体的宣传，让企业把最有效的、最绿色的电器带到这个家庭里面，把这些家庭能源模式里最短的一块板换掉。做到绿色、低碳牵扯到很多技术、标准制订方面的问题，需要企业、公民、政府一起行动。

另一个是低碳出行。我们自然之友倡导在公交系统中给自行车合理的位置，我们每年组织北京的市民，以及我们在全中国10个会员小组的成员以自行车出行的方式，出去尽情体验城市交通中的问题，并给城市规划的专家和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让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位置。

邵益生：



我的角色比较多，讲的时候可能会串，但是不管怎么串，我希望大家把我当做在第一条线进行水研究的技术人员。

我记得2006年国际水协在中国开第五届水大会时，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口号，说“水大会比奥运会更重要”，因为当时正是奥运会筹备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其中的含义。

水的问题跟空气问题、交通问题一样，是城市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也是制约城市发展很重要的因素。

我今天想表达三个观点：

第一，水问题不仅仅是水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人的问题。

第二，水污染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三，饮用水安全保障的任务非常艰巨。

谈到水问题，有三句话——水多、水少、水脏。水多是洪涝灾害，过去很多，现在好一些。水少当然是指缺水，在中国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西高东低的地形，主要的河流是由西向东。这个地理格局决定了水资源的分布上，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西部水少，东部水多。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城市的缺水问题更突出，因为城市用水量多，排的也多。

水脏就是水污染。

城市缺水的问题虽然很普遍，但现在媒体宣传的时候引用的一些数据是不很准确的。现在很多地方都讲，全国600多个城市有一半缺水，有150个严重缺水，每天缺水60亿。这个60亿的数据是15年前的数据，媒体一直用到现在。那个数据的来源实际是个误传，1995年的时候全国对缺水问题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说每天最高缺水1600万方，后来传来传去就成了每天都缺这么多水。实际上，它是指高峰期的缺水量。

原来我们国家由于管网不够，水厂供水能力不够，导致了供水不足，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现在我们的供水能力远远超过需求。由于城市人口多，经济发展用水多而造成水资源短缺，从别处调水是个问题目前的解决途径之一。污染导致的缺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你只有忍受，并花很大的代价长期不懈努力的改变局面。上海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苏州河是上海早期发展的水源，最后水臭了就换黄浦江的水，黄浦江的水不能用了现在就用长江的水。

几十年前，我们国家水源大部分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供水能力提高了、设施改善了，但水质却下降了，这是因为水源污染速度比我们减污、降污的速度更快。近年来国家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增长非常快。但这就好像人像得了重病一样，积重难返。缓解起来要花很长时间。所幸的是，现在国家很重视这个事情，温总理讲要用搞“两弹一星”的气魄搞16个重大专项，其中一项就是污水的控制与处理。

贾峰：



来这儿之前写了一个题目“新环境城市竞争力”。就这个话题我想从两个角度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第一，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样那样的城市排名，比如城市投资排名、城市物价排名、城市的收入排名等。而其中有一个排名大家很关注——北美宜居城市排名。如果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城市排行榜的前几位的话，你会发现，像温哥华、匹兹堡等这样的城市经常排列在前面。如果你有机会去这些城市，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的天都特别的蓝，地都特别的绿，城市的出行特别的通畅，很少有那种像洛杉矶那样的交通堵塞。在那里大家的生活很方便，也很舒畅。这就是说，有关环境一些的基本数据是宜居城市的主要特征，而宜居城市又和一个城市的投资吸引力、人才的聚集度、城市的创新能力

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优美的环境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大家如果有机会回顾一下城市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古代城市的诞生是与贸易、集市和一些教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而近代的很多城市，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的城市，则是跟工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熊本县有一个小渔村，叫水俣村，2006年我去的时候，它改名叫水俣市了。因为那年有人在那建立了一个淡水厂，随着淡水厂的发展和招工、就业等等需要，那个村庄就成了一个城市，它给人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稳定的收入。但是，它给水与人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家知道，那里出现了现在说的世界八大生态灾难之一的“水俣病”。这种导致人神经系统受伤，致人死命的甲基汞病，因为在水俣市发生，所以就以这个城市的名称来命名。

另外，城市的生活往往给我们以错觉，与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完全不一样。在城市里，我们觉得光线不好就开灯；到哪个地方去，有车就会拉车门，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如果看一本书，觉得暗了就开灯，15瓦的不够的话就换到30瓦，30瓦不够就再换度数更大的，你会发现，工业化城市的生活满足的是我们对所谓舒适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基本生存的需要。

去年IEA（国际能源署）发布了的2008年全球能源展望里说，从全球来看，现在的煤炭储量还够用104年，天然气还能用60年，石油还能用40年，而中国探明以上的资源，以石油为例，只够维持13年。所以，城市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脱离人间烟火的、不需要地球支撑的城市。

我的结论是，第一，我们应该有一个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环境。第二，我们应该打造一个为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李崴：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五个文明，从当初的两个文明到后来的四个文明，现在变成五个文明，第五个文明加了一个生态文明。我觉得，生态文明不应该跟前面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是并列的关系，生态文明在这四个文明里面都包含了，甚至可以说是这四个文明的统领。

比如说物质文明，刚才大家讲了，要得到电、水，得到这些物质上的文明，跟生态是非常有关的。而政治文明，我

觉得也是跟生态非常有关的。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涉及到环境、土地、生态问题的上访，势必使得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产生无限的烦恼。

我担任副市长的这个江门市位于珠三角，人口有 400 万，在中国只算是个中等城市。珠三角 9 个市中，江门占了整个土地面积的 1/4，有一万平方公里，非常大。我在江门当副市长十年了，我个人觉得它的发展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虽然这在外界看来可能是有些默默无闻。但是，江门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2002 年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北大的教授来给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规划后来经过江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里面有 8 个优先项目，分成三段，从 2006 年到 2010 年，2011 年到 2020，2021 年到 2030 年，一项一项的推进。

第一步，把污染控制下去。

第二步，转型以后，怎样去发展城市绿色的竞争力？

第三步，怎样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或者按我的想法是达宜居城市的标准？

江门的这种发展模式，我想其实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中庸的思想。我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在第一届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考核一座城市应该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我呼吁了好几次，尽管现在仍旧是用 GDP 来考核，但现在我看到终于还是起了些作用的。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这几年来江门得过国家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等等这些称号。江门的人均绿地有 10 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6.7%，江门是珠三角唯一一个没有重酸雨的城市。我们的 GDP 翻了 10 倍，但水质还保持在二类水左右，这在珠三角里面就是不错的了，且污水处理的能力达到了 70%，垃圾处理能力达到 100%。

我们还是整个广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开平的碉楼与村落。我也是一直主持为碉楼“申遗”这个工作，从 2000 年开始，一直到 2007 年，经过 8 年“抗战”，终于把这个资格拿下来。我记得当时联合国的专家看过碉楼后说，你们这个将碉楼融于乡村的保护模式早就应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树立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典范。我们开平有 1800 多座碉楼，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七项国家的非物质遗产，包括大家比较熟知的广东音乐，像“步步高”，它在我们江门的民间还一直保持着很旺盛的生命力。

今天江门之所以有这些，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牺牲了 GDP。尽管有人说我们这么做使得经济的发展不那么快，但我觉得这个值！为什么值？就是我才说的，唯我们江门目前是广东唯一还能保持绿水青山的一个地方，珠三角里面仅

有的绿地，江门的还有 20 万亩水稻田，被称为广东第一田，这在珠三角是很少见的。

江门说起来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承载地，现在所有江门的人都是两三千人以前从中原地区迁移过来的最古老的汉族的后代。江门还保留着最古老、最贴近中国古汉族的地方文化，比如语言，比如粤剧（粤剧比京剧历史要长多了，这次也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想，一个城市的魅力和竞争力所在，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它的文化。一个城市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人家记得的不是你当年的 GDP 是多少，而是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政府首先应该做到的。

吕斌：



非常感谢五位嘉宾刚才精彩的阐述！我想先给秦院士提个问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家层面为应对气候变化都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的公民最需要对此做哪些回应？

秦大河：



从科学层面讲，人类最近100年尤其是最近50年的活动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它的可能性在90%以上，这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研究得到的一个结论。我们中国政府对此有很清晰的认识。

我记得在 2002 年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的时候，国务院主要领导干部曾经集体听了一个有关气候变化影响和应对的讲座。那个讲座我也参与了组织，当时请了一批国内高层次的科学家来讲。国办对讲座的讲课长度有严格的限制的，一共是 1 个半小时。但有一位老先生讲得娓娓动听，说到 1 小时 40 分钟时，我一看也只讲了 2/3，又不好打招呼提醒他，结果最后讲了两小时 20 分钟。我记得，会上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听的非常认真，朱总理说了一句话，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应该让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知道。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政府很重视，现在胡锦涛同志以及这届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也是高度重视，因此我们才有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这是 2007 年 5 月 30 日宣布的，这也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

吕斌：



下面我们有请贾司长。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正在就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各国减排温室气体安排、应对全球变暖的各国责任进行谈判。我想请贾司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在这个谈判当中遇到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贾峰：



吕老师给了我一个无法完成的作业，我个人从来没有参与过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所以对我方谈判的方案以及感受实在无从说起。不过从其他的角度，作为一个关心气候变化的人，我想谈谈我个人的感受，但绝对不代表官方的立场。

第一，正如秦院士所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国在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组织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叫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总理当组长，副总理任副组长，成员由 20 多个部委组成。我想，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权威的一个专门机构。

第二，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中做的最好，专门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第三，中国积极的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国际交流。有人经常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有人得诺贝尔奖了，秦大河先生就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两个获奖方，一个是组织，一个是个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得奖的组织就是 IPCC，刚才秦院士说了，他是 IPCC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这也就是说 IPCC 过去的报告、未来的报告，跟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对此确实宣传的不够。这里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气候变化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对于我们媒体的记者来说，可能还需要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另外，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人类应对的最新挑战，我们过去主要是就解决的方案、成因做了研究，而实际的行动实施的时间并不长，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也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前不久我们胡锦涛主席在纽约 9 月 22 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就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这几点立场会成为我们国家参加接下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新的气候变化国际公约谈判

的原则。其中一个比较新的原则就是，我们国家准备要承诺到 2020 年前，单位 GDP 二氧化碳的排放数要有一定的减少。在座的各位都在关注到底是减多少？目前的科学家、能源专家正在就此做一些核算，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向国际社会公布这个数据。

与之类似的，我们在“十五”期间，尤其是“十一五”期间，也就是现在，就表示要到 2010 年使单位 GDP 的能耗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 20%。这意味着什么？正如胡锦涛主席说的，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按照我们每年 GDP 增长 7% 多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5 年我们将至少节约 6.2 亿吨的标准煤，这意味着少排放 15 亿吨的二氧化碳。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在现在的国际气候变化公约里面，对中国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减排义务，但是，我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是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的工作。

气候变化问题很严峻，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能源的安全，因为按照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我们的经济是不能为继的，因为我们工业所依赖的血液是不能为继的。因此，在 2007 年 8 月，我们国家制订了一个中长期可再生资源的展规划，规划到 2020 年中国可再生资源的消费，在所有能源中的比例力争占到 15%。比如说到 2020 年，风力发电的装机能力是 3000 万千瓦。两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马上要修订这个方案，就国家发改委的能源局的张国宝局长说，可能要把风能的规划目标修订为一个亿，甚至还要多一点。事实上肯定要修订，为什么？从 2005 年到 2008 年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中国风电装机能力每年以 100% 的速度在增长，到 2010 年，我们就会实现我们当年制订的 20 年风力装机能力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人，有人说是做的多，说的少，未来为了使国际社会对于我们中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仅要做的多，该说的还要说，但是这个任务可能得靠媒体多多参与、介绍，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的公众，也包括国际社会的成员了解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转型期、工业化时期的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多少了不起的工作。

李斌：



我插一句，贾司长说的这个降低20个百分点的能耗，这对于我们下面这些城市的市长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而且已经立了军令状了。我们广东的能耗下降20%，分下来，每年要多少？今年听我们广东省长说，今年广东可以下降3个点，这意味着

我们很多工厂不能上，很多产品要转型。这是个痛苦的过程。

吕斌：



下面有请李波总干事就我们个人生活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包括你们NGO组织的一些想法、措施，在推行的过程中，我们一般市民的接纳程度怎样？难点在什么地方？

李波：



两个困难的地方：

第一，当市场给公众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公众很难马上就接受这个技术，这里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经济支付能力的因素。所以说，产品从设计环节开始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可能影响中国各地方公众接受这些新技术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另外，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也有助于公众接受这些新的尝试。

第二，尽管，我们看到国家已经有这么大的决心来减排、节能，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产做一些不太合法的事情。举例说，我们上海小组有一班会员住在一个排放气体不达标的地方。市民已经反映了多次，一直没有改善。他们向上海宝山市的环保系统申请信息公开，去申请的过程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坎坷，各位到我们的网站上可以去下载这些通讯，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会员是如何小心翼翼的去做这件本来是一个合法程序的事情的。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和跟当地环保系统的官员去打交道，但是最后想得到的信息不一定能得到。

所以我想，我们的公众怎样应用现有的这些政策、法规，使之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吕斌：



我们现在再次把话题转到水资源、水安全的讨论上。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在解决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上，采取的比较大的动作就是跨流域的调水。我想请邵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跨流域调水措施实施的过程中，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另外，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开始酝酿自来水涨价，包括北京、上海、沈阳等等一些大城市都

开了上调水价的听证会。水价上调不仅仅对产业有影响，对我们一般市民的生活也有直接影响。我想请邵院长从专家的角度，谈谈水价上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一种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透明的、合理的水资源配合机制和定价方式。

邵益生：



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国家调水工程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还有更多要探索的。我感觉比较成功的，最典型的是我们几个沿海城市，比如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大连的引碧入连工程，引黄济青（青岛）工程，这些工程按照预期规划的目标逐步的进行，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也有些工程是失败的，有一些可能现在情况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比如说山西的一个工程，当年设定的目标是引水12亿方，现在调水实施五、六年了，现在的用水量却不过几千万方，最终水调过来，却卖不出去，当然这跟水价也有关系。

大家最关注的，也是最复杂的就是南水北调。关于它，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讲，南水北调工程有三条线，东线是延着古运河，从江苏扬州到天津，这条线在推进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即它促进了沿线地区的污染治理。西线工程现在还处在上不上的讨论当中。中线工程是最敏感的工程，中线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引水，通过河南，穿黄河、河北到北京，再调线到天津。中线工程主要面临三个方面不确定性。一个是水源区本身现在经济发展需水量在增加，已经感到自用水不够，调这么多，当地怎么发展？另外是如何保证好的水质一直维持下去。

再有，以北京为核心的天津、河北这些地方，令当时的很多决策者始料未及的是，现在这些地区的需水量、供水量跟当年估计的量差的太大了。以北京为例，十年前当时的用量是 45 亿，这几年只有三十几亿，原来估计 45 亿会涨到 60 亿左右，要调十几亿的水才能满足需求，但是现在整体需求反而降了很多。这跟这些年北京做的工作有关，特别是明显的调整了产业结构，农业大大减少，且把原来大规模需水的水稻减掉了，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节水性的灌溉，再有工业结构的调整，节水改造等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城市生活水量在增加，因为人口在增加，这是一个刚性需求。北京是这样，天津、河北也差不多。整个中线是一百多亿，以后水调过来，怎么用，需要进一步来研究。

第三是安全输送问题，一千多公里，沿途经过二百多个河流相交，输送效果怎样，会有什么生态影响等等。总之，

情况非常复杂。

我现在感觉到非常担心的是，在很多地方，包括我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现在还在准备搞大规模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具体忘记是哪个城市了，它也就有二三百万人口，却规划到 2030 年工业用水这块要增加 40 亿立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40 亿是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工业用水量的两倍。

所以，我感觉我们过去搞大规模跨流域调水这条路有它的不得以之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它的必要性。但经过了几十年，对这种做法还要认真总结一下，不好盲目再上项目。前几年我们在工程院做咨询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受到温总理的肯定。也就是从战略上我们要有一个调整，不能没水了就调水，越调越远。而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我们当时提出来，节水、节流优先，控制需求，治污为本。如果污染不解决，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白做。还有多渠道开源的问题，不仅要调水，还要包括雨水的利用，海水的利用，再生水等等这样多渠道，多途径的解决方案。

说到水价。最近半年我多次婉拒了媒体的采访，没有谈水价的问题，原因是水价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第一个，从国家法律政策上来讲，我们现在的水价是政府定价，不是市场定价，为什么？因为水是公共产品，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二个是根据什么定价？基于成本。这是市场的要求，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这两方面怎样结合？这涉及到政策决策的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水价构成比较复杂。理论上分解水价很简单，成本加税收加合理的利润，加费用等。水价分三部分，一个是水资源费，我们北京的水价里面有 9 毛的水资源费，其他地方就是几分钱，为什么北京是九毛？就是由于南水北调。还有一个是工程水价，是分段的，尤其是调水，从一个地方输入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计价的。还有一个我取到这个水以后，水处理完了以后，供给千家万户，这是一个价格，这是自来水费。一个是污水排出来以后叫做污水处理费。如果调水越来越远，工程水价基于成本的话不就是越来越高吗？从自来水这边看，水污染了，过去处理水的工艺已经不适用了，现在要改造，增加投资。现在要求的水处理技术高，成本也高，处理自来水的成本就上去了。污水处理的费用这块很大，在国外甚至比前两项加起来还多。

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基于成本的原则，水价必然要上涨，不涨就只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企业亏损。可是这个

企业是谁的企业？当然中国企业现在产权也是多元的，有国有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但企业不能亏损，企业亏损就不能持续下去。要维持就得有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钱哪来的？税收，可税收还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难就难在这儿，怎么弄最后都会落在消费者的身上。

所以，我想，要采取各种的手段，积极的手段，法律管理的手段，控制那些不合理的用水需求。我刚才讲的那个城市预测未来用 40 亿水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不合理的用水需求。如果我们把用水总量控下来，把水污染的总体负荷降下来，成本才能降下来。现阶段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回收成本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所有的成本都要让消费者



新环境分论坛讨论现场

者来负担？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成本大概分两部分，一个是固定成本，一个是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是投资在基础设施、设备上的。这是由政府承担的，但现在这方面投资的规模差的太多了。我想，是不是今后在固定成本方面，政府需要更多的进行投资？另一个是，变动成本或运行成本，这个我想是需要消费者来分担的。当然，具体怎么做，这需要政治性很强的考虑。总之，我们一方面要解决老百姓基本的安全用水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个平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使之不断的趋于合理。

现在，我们国家确立的重大专项里面，光水这块一个研究就有 300 个亿，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它同时也带来了工程方面的相关的建设等等，规模是非常大的。我相信，等你们年轻人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中国用水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很多。谢谢！



杜 平



韩文科



梅永红



董秀成



朱 海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 • 新能源分论坛

新能源：未来发展“战略高地”之争

New Energy: Competition on “Strategic High-land” of the Future

主持人：

● 杜 平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主任兼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主任，研究员。现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以及中国科学院资源与地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1982年以来，先后在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地区协作计划局、地区综合计划司、国土地区司、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工作，历任过处长、所长、司长等主要行政职务。

讨论嘉宾：

● 韩文科

198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文科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能源政策和能源发展战略分析的研究。对中国能源供需预测和能源规划、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安全与能源储备、能源价格改革、国际能源合作、石油和天然气发展战略、电力体制改革以及节能技术政策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

● 梅永红

2006年7月至今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1997年至2006年6月，在科技部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调研宣传处副处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主要从事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调研、重要文件起草等工作。1995年至1997年，在原国家科委农村中心工作，先后从事科技扶贫、农村政策调研等工作。

● 董秀成

能源经济学家，博士，现任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副院长，兼任北京市石油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石油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可持续战略管理》杂志编委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是能源战略管理和国际石油经济，长期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国内大型石油集团公司提供战略和政策咨询工作。

● 朱 海

施耐德电气全球高级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杜平：



在几位专家做主题发言之前我想对分论坛的背景做一点说明。我个人对今天的主题有三个观点：

第一，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和新能源在我们国民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国际化大潮了，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三件事是很重要的，一是我们传统的能源受到资源约束，第二是我们的环保、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第三是作为产业发展来讲，总是有一个产业接替、更新的过程，新能源作为战略性的导向也需要摆上议事日程。

第二，发达国家由于有资金、技术等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在新能源产业里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我认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且现在可以说大规模的商业化在这些国家推进已有基本条件。

第三，我认为中国在这一波潮流中采取的战略，不应再是紧跟其后，而应是积极、直接参与。特别是这两年，众所周知，中国的风能、光伏发电等等，都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速度发展，所以我们叫做迎头赶上。

当然，就中国而言，我们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新能源或者说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还包括水电，也是中国的强项；优质能源，包括核能等等）它和传统能源相比优势和劣势是什么？第二，在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它的使用前景或者它的潜在什么地方？第三，中国如何在这个领域与国际上加强合作。我想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指望今天这样一个论坛能全面地解决或者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非常相信通过这样的论坛能够促进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者解决。这也是我和环球杂志社共同发起这样一个论坛的原因之一。

韩文科：



新能源现在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从议题来讲我想说这么几点：

第一，大家都说新能源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作为能源研究者，我是从这几个方面感受的：第一是从

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来看，工业革命以后能源首先是以煤炭为主，它对工业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接下来过渡到以油气为主，它使现在世界上这些发达国家大大受益，当然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也在迎头赶上，比如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在买汽车，都已经享受到油气这一能源了。

但我们知道煤炭和石油、天然气是化石能源，它的储量是有限的，所以能源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后要用什么？21世纪末期或者22世纪用什么？

此外，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能源大规模的利用应用了各种现代高科技，能够把地下的煤炭大量地开采出来，甚至地下或海底埋藏很深的石油、天然气都能发现并开采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能源和资源消耗速度加快，使得寻找新的能源的速度也在加快，这样能源转型的速度就相应的非常迅速，因此我们就感受到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到现在，国际社会对能源的转型非常关注，大家都在寻找到底什么是未来的能源。

现在的新能源是相对传统能源而言的，它是一个总体的概念，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大家感觉到它已发展起来，而且能够替代一系列的化石能源，所以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能源，至少是未来能源中很大一部分。但人们也在探索新的能源，比如说氢能会不会发展起来？核聚变会不会发展起来？人们还在探索新的能源利用途径，比如可燃冰，这是把传统能源再衍生等等。但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风能、太阳能的前途远大，它们都跟太阳这一能量源有关，太阳是一个可再生、可持续、可利用时间非常远的能量源，只要我们这个太阳系正常存在，地球人就能永远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所说的战略性。

第二，新能源是一场革命，这个革命性在哪里？我的理解是，看看过去20年、30年，特别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叫它浓缩式的发展：工业化的速度快，城市化的速度快，所以能源的消耗速度也很快。放眼世界，自石油危机以来，全球的科技革命发展迅速，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等都发展很快，这些革命推动新能源迅速



的发展。过去在实验室做的事情，现在逐步变得工业化、商业化，而且有些可以规模化。比如过去的风机，70 年代世界上还没有几台，但现在许多国家都是大规模地开发风机，且它的成本下降迅速。比如太阳能的光伏发电，50 年代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要用到卫星上。再比如现在薄膜太阳能技术就是大量地运用了现在的制造技术、纳米技术。

所以，将新技术运用到新能源的这个革命给能源领域带来了很大变化。在几年之内，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出来，成本下降地越来越快。在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感觉到需要在科技革命里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也一定要紧跟时代。

第三就是新能源的发展，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我的看法是，新能源它既然是一个战略性的能源，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是一个未来的能源，现在正逐步地替代传统能源，所以对它的投资应是既投资现在又投资未来。每个国家对新能源发展的战略就不一样。以美国为例的很多发达国家，因为已经站在很高的一个起点上，它的经济已经轻型化、科技化、知识化了，所以它会把大量的投资放在新能源的技术革命上去。而发展中国家，因为它要解决自身的贫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人民如何富裕的问题，它的投入和科技实力是有限的，所以对未来投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对新能源要有准确的认识，既要投资现在又要投资未来，在这里要找到一个平衡。

另外一点，新能源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风能，实践证明陆上的风电可以大规模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就是说采用市场的办法完全可以解决，就是国家只要制定一些特殊政策就可以了，它的成本已经接近常规的火力发电等方法了。而且如今风机制造得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风电开发的更好，使单机的风机更大，怎样从陆上到海上开发更多的风力资源。

但是太阳能发电就不一样了，它的各项技术是平行发展的，光伏发电要用大量的硅材料，需要转换；热发电要用水，效率比较低，因此是用光伏发电还是热发电，各有利弊。同时太阳能发电的价格较高，可能一千瓦装机要一块多到两块钱，另外它的转换效率比较低，一个光电板转换效率只有百分之几，所以大规模的发展就会面临电价很高的问题，由于还处于商业化规模化的初始阶段，因此我们看待它就应该有不一样的态度。还有潮汐能、海洋能、生物质能也都在发展，比如美国就可以用大量的玉米做生物质能，但是中国可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状况，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也都不一样。我认为应该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适合自己国情的政策，去推动它。

所以我的看法从这三个方面总结出来就是：一新能源产业

是一个战略性的产业，第二个就是它处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中，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第三个我们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只要这个道路得当，我们就能够发展起来。

梅永红：



我想从宏观层面上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部分国家政治家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态度。第二个是部分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政策。第三是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发展我的思考。

昨天晚上我特别摘了几个方面的材料，比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这样说的，加强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应对环境和能源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高度重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把可再生资源利用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可再生资源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正在被全美各地运用着，尽管不断有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发生，但可再生资源领域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英国首相布朗说，发展低碳经济不应因全球经济衰退而延缓，相反低碳经济可成为全球复苏的强大推动力。日本政治家福田康夫说，自从工业革命崛起到现在，是我们必须摆脱对矿物质燃料依赖的时候了，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向低碳社会转变。

第二是各国的行动。美国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路径之一。美国政府把经济刺激计划拨款中的 218 亿美元用于节能的投入，把 200 亿用于对新型汽车的研发和推广，对可再生资源实行补贴。可能在座的各位还知道，在通用公司破产保护期间，美国政府向通用公司注资，但是这个注资有前提条件：到 2014 年通用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必须占到全部汽车产量的 60%。欧盟在经济复苏计划当中提出，要实施绿色汽车伙伴行动，能源建筑伙伴行动和未来工厂伙伴行动，就是要在汽车、建筑、和工厂实现“绿色化”。日本加大了对能源研发的力度，投入到新能源研发的预算由 882 亿日元增加到 1156 亿日元，政府实行税收返还，商业银行给予低息贷款的政策。韩国计划到 2012 年投资 6 万亿韩元研发绿色能源新技术。

另外我想谈谈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以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能源环境问题。首先是能源的刚性需求，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发展的这些年，中国对化石能源需求量一直在高速增长，我们本身的供给又是非常有限的，我看到的材料显示：我们国家现在

已探明储量的石油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13，天然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17。即便我们认为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平均水平 42%，我们还要发展，我们还要成为世界的工厂，这样能源需求的刚性增长和供给不足就是一个必然的矛盾。所以怎样解决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能源，维护我们的能源安全，这是一个大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点，传统能源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影响。我想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工业发展、排放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影响。现在我们国家的酸雨面积占到国家总面积的 30% 到 40%，我们国家民众健康领域方面，呼吸道疾病发病状况呈直线上升。我了解到在我们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经跃居所有癌症之首，这是和我们的大气环境恶化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印度有一句谚语就是“看到空气、阳光和水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借贷”。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维护这一片蓝天碧水，是每一代人都应该持有的一种责任，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对我们国家发展新能源的一种历史情结。工业史说到底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对能源的开发利用一直贯穿始终。但是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在历次的工业革命当中，中国都与它失之交臂。去年底我们的刘延东女士带着一个团到英国考察，访问了英国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展现了近代工业革命几乎所有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展现了几乎所有对人类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诸大的自然博物馆里面找不到中国人的影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中国在近代为什么落后，那就是我们跟数次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今天我们面对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当世界各国又在思考世界未来向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实际上就酝酿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我们不愿意再失去这样一次机会。

董秀成：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对整个中国的能源发展的一个认识问题。我想直到目前，中国的能源发展依然面临着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我们的能源结构长期以来是以煤炭为主，而且煤炭的结构比例不但是没有降，还在上升，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是一个能源结构的优化问题。

其次就是能源价格，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个非

常敏感的问题，但是直到目前，能源价格的问题，我们依然没有解决。能源之间的价格关系不协调，能源价格和价值长期脱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实际上能源价格问题不光是要解决传统能源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它也是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如果能源价格不解决，新能源的发展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初期，国家财政上可以做适当的扶持，但是长期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新能源价格跟传统能源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必然会导致新能源发展受到障碍。例如传统能源价格低，大家就愿意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律。价格问题是制约了新能源发展的关键。

另外，我们下一步国家能源发展重中之重的政策——节能，与价格也是紧密相关的。能源价格处理不好，怎么节能？怎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能源革命。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能源革命，比如从柴草时代发展到煤炭，然后又发展到石油，发展到天然气。前几年还在宣告 21 世纪是天然气的世纪，现在又开始了新的能源革命。但是想想每一次能源革命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能源完全代替另一种能源，所谓的新能源革命无非是新能源的比例上升，但是传统的能源，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是不会消亡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无外乎是在整个能源结构上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

另外新能源革命也是战略性的、趋势性的、长期性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掀起这样一个新能源革命，各自都进行了比较大的投入，但是这些投入我认为还是非常小的。这个革命是缓慢的，没有几十年的时间的話，让新能源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是很难的。现在有数据显示，能源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大概是 10%，新能源大概占能源的 10%，这样的话算一算整个新能源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只有 1%。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这个问题要从战略性、长期性、趋势性判断。但我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不搞新能源方面的投资，只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看作已经是很现实的事情。

第三个想法就是中国新能源发展的一些思路问题。第一，新能源的发展绝对不能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过去的能源管理基本上是一个强调总量平衡，计划为主，行政干预为主的体制。但是对新能源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对于新能源，国家发展的思路一定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必须走全新的市场化的道路。

具体来讲，比如新能源的发展，我认为行政干预要少一些，例如最近发改委制定的，有关产能过剩之类的内容，我认为政府部门说过剩不过剩不一定是合适，究竟谁有资格说它过剩不过剩呢？是市场，我想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就是



要由计划向市场过渡。

第二个就是政府不是没有角色，政府的角色是引导，而不是干预，引导什么呢？把新能源产业引导到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上来。为什么这里面强调规模化呢？我想，现在新能源产业有些分散，政府可以引导。引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技术的自主创新，这是核心。其实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抢夺未来的制高点的手段是什么？是技术。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丧失这次机会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新能源自主技术，这是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

的关键，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觉得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政府在初期要做的事情是引导扶持，当然这个扶持不能“撒胡椒面”，这个扶持一定要有重点，新能源的概念比较大，国家确定了要发展哪个领域或者哪个产品，政府的投入就投向这个方向。既然搞规模化，就应该是

有条件的扶持，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让不让你干，让不让干是市场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观点，这是我的主张，可能在座的包括我们其他领导不一定同意。我认为新能源这个产业发展，国家应该引导现有的大能源企业，比如石油、煤炭、电力等等去做。国内现在大石油公司都强调能源多元化，从国家的层面为什么不引导它们做这个事情呢？这样的好处是容易形成规模化，还有资金保障。

最后就是要打破壁垒。我们现在说是一个能源行业，但是能源行业又分石油、煤炭、电等等，现在还有壁垒，这样的话也是不利于整个能源的协调发展的。比如我搞风能，风能入网了怎么办？这是跟电力部门有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或者管理机构打破这个壁垒，新能源发展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现实情况下，这种壁垒很难打破，所以你要想发展新能源，这个壁垒必须从国家这个层面上，从管理这个角度消除掉。

朱海：



我借这个机会从企业的角度，给大家讲讲我对新能源或者低碳经济或者叫做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

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点是大势所趋。大家可能知道，根据预测，整个世界到2050年，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能源的消费量将增加一倍，而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为了控制地球变暖，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减少一半。一方面能源消费要增加一倍，一方面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减少一半，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次，

可能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最大的排放国之一。最后，从经济，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 7000 亿美元经济刺激预算中，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投资到新能源上面，他们希望用三年的时间使新能源的产量在现阶段基础上翻一倍。欧盟围绕经济刺激计划中也有一个新能源计划，总投资是 1050 亿欧元，欧盟希望通过这个投资能够保持欧盟国家在新能源以及节能、增效各个方面的技术优势，使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谈到中国，中国最近有一个三万亿的经济计划促进新能源的发展。此外国家的电网公司也准备投资几千个亿进行智能电网的改革。电网效率的提高会极大地减少能源的消费。所以综上所述，这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我们应该广开思路，我们面临的机遇无限。我用机遇无限，而不用商机，为什么呢？因为机遇不光对商人，对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是有无

限的机会。当我们谈到新能源的话题时，我会想这个话题会不会也包括我们讲的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也就是说在提高新能源在总能源生产比例的同时，我们可能要把很大一个重点放在节能增效方面。我给

大家另外几个数字，中国现在的能源消费大概是 24 亿吨标准煤，其中一半的消费是电能，而在电能中间，我们做过一个分析，从电厂把电输送出来到用户端使用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电力浪费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用户端每使用一度电的时候需要电力厂家生产三度电，是一比三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间节约一点用电，对我们整个达到节能增效方面起到无限大的作用。

我说一个小故事，在全球的电力消耗中，大概有一半的消耗是由马达产生的，在这个马达里面只有 10% 的马达使用了像施耐德公司提供的或者其他类似公司提供的节能产品，这样的节能产品可以使这些马达节省 10% 到 20% 电力的使用，如果全部的设备装上这样的设备，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必须开阔思路，从各个方面节省用电，这是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可以在里面可以做的贡献，每个企业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商机。

第三，如上所说，节能增效不光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这里有很多的实例，我们在法国总部的大楼是一个旧楼改造项目，经过改造以后，它每平方米的用电量从原来的一年 100 度变成了 50 度，光是电费的节省，三年就可以收回所有的投资。再说一个例子，我们跟某个著名的跨国的零售企业在中国合作，陆续对它的 20 个旧店进行节电的改造，整个改造的投入是 5000 万人民币，所有的投资三年就可以收回。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盈利的模式，对企业

来说一方面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完成了政府下达的指标，同时对企业的效率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很希望更多的企业抓住这个机会，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自己企业的竞争力。

杜平：



我们这个单元的时间已经到了，大概还有几分钟，我对于这个分论坛做这么几点小结：

一个是我们关于新能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涉及到国际、国内、宏观、微观、技术、政策、体制方方面面，各位都到了。论坛的形式不是上 MBA，也不是上大学，它是要点到为止，

大会交流及总结

杜平：

我们这个新能源的分论坛，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讲，应该说是获得圆满成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首先要判断，新能源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它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这样我们才知道怎样占领这个发展高地。

第二，新能源是一个战略性产业，考虑到它的需求时，首先市场是一个基础，但同时不要忘掉了政府必要的扶持和支持。

第三，大家围绕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进行讨论时，要考虑一个战略取向的问题，它既包括我们国内应该做的事情，也包括怎么和世界进行广泛的合作。

周牧之：

最近在北京开会，很少有开到这个时间没人走的会，至少我们新生活分论坛的会场内没有看见有走的，一个都没有看见。这说明第一会议组织的好，第二个我们的话题非常吸引人，要不然大家都那么忙，早走掉了。

总结起来，最后我对中国的城市化讲了三大建议：

- 1、中国要走大城市、大城市群发展的道路。
- 2、农民要进城，户籍制度要改革。当时已经有一亿几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却没有真正的定居下来。
- 3、要认真应对汽车社会的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答的时候，媒体的关注集中在房地产价格上，忽略了对环境和对轨道交通问题的探讨。十年前，情况就是这样，这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在台上的嘉宾们，基本上是搞政策研究的，或者本

作为一个重要的导向，我们的分论坛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第二个，我发现，我们每一位专家，实际上都是很清楚的，他们准备也好，不准备也好，对大家的问题实际上都胸有成竹，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藏着掖着，都是真诚客观的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也说明我们组委会邀请这四位专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第三个，就是我观察到我们的听众，不论你们来自哪里，但是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都认真的在记录或者思考，特别是踊跃的提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是多次的压制大家的热情，对此我表示歉意。

最后，我想代表分论坛，对我们的专家、听众，也包括对我们的译员，还有我们在座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谢谢大家。

身是制定政策的人。在问答过程中感觉台下的媒体与台上的嘉宾们的话语隔阂非常大，甚至互相之间沟通都有困难。今天在论坛上，台上的人有话语权的优势，但是一到明天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朋友有话语权的优势，这两个有话语权圈子的不融合产生的社会误会的副作用将是非常大的，长此以往有可能造成中国被这种误会合成的社会谬误所拖累，这也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由新华社环球杂志社来做，沟通中外，沟通政策制定者和媒体的论坛，非常有现实性。对于我们这一场讨论也好，我们整个论坛也好，它的价值其中有一个就在这儿。

吕斌：

我们环境分论坛有这么几个观点可以跟大家共享：

第一，全球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的责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从政策到实践上，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包括我们的国民，实际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对我们了解不是太多。

第二，关于水的问题。相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气问题，以及刚才周教授谈到的交通拥堵问题，水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当前，特别是在城市大家最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十分的严峻，在这里讨论嘉宾非常清晰的，深入浅出的把我们国家当前水问题，包括水资源缺乏和水污染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大家有三个基本观点：1、水问题本身是人的问题。2、水问题中水污染是最大的挑战。3、水污染中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当前的饮用水问题。

再一个，关于水价调整这种机制如何照顾到弱势群体，如何增加它的透明度，大家讨论得非常深入。

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日程

论坛主题：世博会：新生活、新环境、新能源	大会发言	主 持 人：吕 斌
主办单位：新华社环球杂志社	09：50-10：10 上海世博会：中国发展新里程（黄耀诚）	讨论嘉宾：秦大河 贾 峰 邵益生 李 崑 李 波
支持单位：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10：10-10：30 从世博会看人类社会发展新动力（吴建民）	分论坛三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智力引进办公室	10：30-10：45 茶歇	新能源：未来发展“战略高地”之争
赞助单位：ROCKFIELD INTERNATIONAL INC.	10：45-11：05 友谊让城市更加美好（陈昊苏）	主 持 人：杜 平
北京中广天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题演讲	讨论嘉宾：韩文科 梅永红 董秀成 朱 海
日清奥利友集团株式会社	11：05-11：40 世界经济的现状与课题——应对经济危机之日本经验（小手川大助）	16：10-16：25 茶歇
株式会社协和	12：00-13：00 自助午餐（全体嘉宾、媒体记者）	下午 大会交流总结（茶歇后）
论坛日期 2009年10月17日	下午 分论坛（茶歇前）	16：25-18：00 大会交流及总结
论坛地点 北京·昆仑饭店	13：10-13：30 分论坛签到	特邀主持人：闫丘露薇
论坛日程 2009年10月16日	13：30-16：10 分论坛一	交流嘉宾：各论坛主持人（周牧之 杜 平 吕 斌）
日方嘉宾抵京、签到	新生活：寻找城市发展的平衡点	17：25-17：40 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主题演讲：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与东亚（杉本和行）
18：00-20：00 中外部分嘉宾内部交流晚宴	主 持 人：周牧之	17：40-17：55 “世博周期”与中国经济发展走势（郑新立）
2009年10月17日	讨论嘉宾：胡存智 陈 淮 朱中一 斋藤圭介 吴文化	17：55-18：00 大会总结（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主办方负责人）
上午 全体大会（全体嘉宾出席）	分论坛二	18：00 论坛结束
09：00-09：30 ①大会签到	新环境：未来城市的“绿色竞争力”	18：00-20：00 VIP晚宴
09：00-09：30 ②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会见部分与会外方嘉宾		
09：30-09：40 特邀主持人闫丘露薇介绍本次论坛议程		
09：40-09：50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周锡生致辞		

中外部分嘉宾交流晚宴



与部分外方嘉宾内部交流晚宴内景



晚宴嘉宾合影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右）与日本财务省顾问杉本和行（左）



小手川大助（左）与新华社前副社长、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荣誉主任高福秋（中）、日本财务省顾问杉本和行在一起



中国公开发行的中文游艇期刊
CHINESE JOURNAL ABOUT YACHT

订阅服务热线：010-58208898-815 传真：010-58207195 E-mail:liye@horizonmedia.com.cn



e.p books
Carry your library.
汉王电纸书

您的随身图书馆

汉王电纸书，越读越精彩



汉王电纸书商务版，
外观稳重大气，兼具文化内涵，您的品味之选！

您的随身图书馆

5寸屏幕，轻薄小巧，可轻松放进上衣口袋。预装千本正版书籍，还可网上下载更多，让您随时随地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显示如纸不伤眼

汉王电纸书采用电子墨水技术，显示如纸，无辐射，不伤眼，在阳光直射下照常阅读；低功耗，一次充电，可阅读15天之久。

能读能写惊喜多

汉王电纸书手写系列，采用汉王顶尖手写识别技术和电磁传感技术，实现手写、键盘双输入。内置记事本，带给您纸书一般的阅读体验，让您随心修改随意记。

电话：400-810-8816（免长话费） 010-82825656

提供免费上门演示服务

